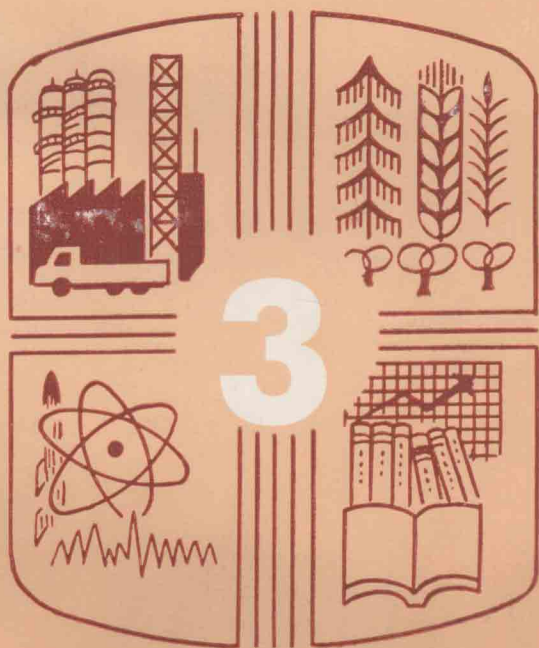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时期

四会党史资料选辑



中共四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四会党史资料选辑

(社会主义时期)

(三)

中共四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肇庆市党史资料丛书

主 编 冼鸿雄
编 辑 黄建灵 樊灶淦
 赖悦祥 潘长荣
封面设计 陈均甫

四会党史资料选辑

（社会主义时期）

（三）

中共四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广东省四会市印刷厂印刷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出版

广东省出版刊物印刷许可证144号

前 言

为今后编纂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四会市党史》做好准备工作，我们在前期编辑出版了社会主义时期《四会党史资料选辑》（第一、二辑）后，又抓紧进行第三辑的征集工作，在全室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共征集编写了17篇党史资料、论文、专题、人物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现将这些党史资料汇编成书。今后我们仍继续编辑出版党史资料，供大家学习参考。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单位和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祈望读者见谅斧正。

编 者

二000年十二月

目 录

一、苟利国家生死以

记四会人陈友群

.....梁柯平 (1)

二、打击违法行为 促进经济发展

— 四会县“三反”、“五反”运动的回顾

.....冼鸿雄 (31)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四会县党组织建设的作用与问题(1956年下半年—1965年底)

.....黎国荣 (42)

四、正确的开端 不幸的后果

— 四会县整风反右斗争情况概述

.....黄建灵(65)

五、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搞好现代化建设的保证

- 四会县在“四清”运动中对待干部问题的启示

..... 冼鸿雄(74)

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 五十年代四会水利建设的回顾

..... 樊灶淦(85)

七、依靠政策 落实措施 共渡难关

- 略述四会克服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经验和教训

..... 樊灶淦(93)

八、五十年代四会工人运动概述

..... 赖悦祥(110)

九、青年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 五十年代四会青年团的建立与作用

..... 潘长荣(123)

十、革命和生产的“半边天”

- 五十年代四会妇女工作综述

..... 赖悦祥(133)

十一、旗鼓在前 百战不殆

回顾四会五十年代的宣传工作看
其今天的重要性

..... 冼鸿雄(147)

十二、严肃执纪，是革命事业前进的保证

四会五十年代纪律检查（监察）
工作的回顾

..... 樊灶淦(159)

十三、依靠政策 加强合作 促进发展

四会五十年代统战工作概述

..... 樊灶淦(168)

十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四会县党组织 活动的概述

..... 黎国荣(178)

十五、浅述四会县的肃反及其历史作用

..... 黎国荣(189)

十六、澳门的精英 抗日的先锋

..... 黎国荣(199)

十七、丹心为党国 热血写春秋

记述陈少陵烈士

..... 黎国荣(207)

苟利国家生死以

——记四会人陈友群

梁柯平

(一)

陈友群同志1918年生于广东四会县城南门街。他年幼时，父亲多年在外，不顾家室。全靠母亲劳作、养猪，维持一家生活。他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辍学在家帮母亲养猪。每天天未亮，母亲就要到十几里外的酿酒作坊买酒糟（喂猪的饲料），他则站在家里的灶台上煮猪粥，还要照顾幼小的一妹一弟。一年后，祖母眼看长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作为学费，让他上了四会中学读书。

学费解决了，母亲却没钱给他买书簿。后来得到上届同学的同情，借来已读过的课本，又从邻居要来没用的旧式账簿，拆开缝线，逐页翻过来，钉成许多簿子，用来抄课文、做作

业。没有钱做童子军服，日常还可以照样上学，但遇到节日全校集会，或整队出游时，他因为没有童子军服就不能参加。这类事曾使少年的他感到尴尬和羞愧。有过一年失学和养猪度日的生活，使他深深体会到生活的艰难和母亲的劳苦。所以他很敬爱母亲，也知道发奋读书。读小学时，晚清举人黄桂瀛老师和初中一年级时的苏世杰校长，经常讲授古文和诗词，使友群在古典文学方面打下了一点基础。

接着，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的四会子弟严元章接任四会中学校长，并带来一批金陵大学毕业的老师。他们学识丰富，思想开明，治校有方，学校面貌焕然一新。除了扩充课室，增设学生宿舍，开辟球场，将原校园内的孔庙大成殿改为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外，学校还设了三个工读生名额。严校长很珍爱友群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让他半工半读，每天下课后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严校长为图书馆购置了包括《万有文库》在内的各种图书。图书馆的工作使友群眼界大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一位思想进步的中学老师袁雁沙对他的思想影响也很大。少年陈友群很早就树立了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并和几个志同道合的

同学，在校门口定期出壁报，阐述读书心得。在添置图书时，他又为图书馆添置了好些富有革命倾向、有益青少年身心的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书籍（如鲁迅、茅盾、巴金、冰心等人的著作）。

四会的爱国人士发起救国募捐，支援马占山及蔡廷锴将军抗日。友群和同学们一起上街宣传劝募。他们敲开了县长的门，希望县长慷慨解囊，为各界人士带头示范。没想到这位县长竟说：“你们这个三等县，这么穷，我有什么好捐的呀！”在学生们苦口婆心的恳求下，才拿笔签了个很小的数目。那时的老百姓，无人不知当官的都“刮地皮”，何况一县之长？这次县长的丑恶表演，深深地刺痛了少年学生们的心，此事也使友群终生难忘。

初中毕业后，经人推荐，友群在县立第一小学当教员，并任四年级班主任。在中学读书和小学从教这段时期，因受袁雁沙的共产主义思想启蒙教育，友群开始思考救国救民之道，他读书的范围也日渐广阔，从进步文艺作品扩展到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发展史和哲学史等。到十七岁时，马克思、列宁、李大钊、陈独秀的著作（小册子）以及鲁迅的杂文等，都被他

视为自己的指路明灯。在此期间，日寇陷我东北，魔爪伸向华北，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友群已难安于教书生涯。1935年，袁雁沙在广州大中中学当代课教师，团结了一部分思想进步的学生，并把其中的黄森、叶泽权、董世扬等介绍给友群，互相通信，互寄读物，交流思想。他们，加上起先在四会教小学、不久也去了广州的刘公亮，很快结成了知心朋友。友群的妹妹陈芝（智鸾）当时受友群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家中常常见到广州寄来的进步书刊，也跟着看，所以抗战开始不久，就在当地的共产党员带领下参加抗战，走上革命的道路。陈芝回忆说，她常以有一个奔赴延安抗日救国的哥哥为荣。

同年夏，广州的地下党组织了一些青年下乡作救亡抗日宣传。共产党员梁湘率领一支宣传队到四会，友群努力为他们联络奔走。宣传队先到友群任职的学校宣传，然后到县城组织群众火炬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这次活动为地方反动势力所不容，宣传队实际上被“监送”出境。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带着一班人跟着游行队伍，准备必要时逮捕他们。好在游行到

码头，宣传队就上船返广州，未致出事。友群则因为参加这次活动而被学校辞退，由此失业。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寻找共产党，友群毅然离开家乡，到了广州。时袁雁沙已去了广西。大中中学高中生、地下党员梁湘介绍该校的初中同学黄森、叶泽权、董世扬等人加入了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友群到广州后，也随即在1936年初加入了“中青”，从此参加了革命。友群和这伙热血青年一起，成立读书会，办刊物，在学校散发传单，参加响应“一二·九”救亡运动的示威游行。

同年夏，经严元章校长的哥哥（时在广州市卫生局任职）的介绍，友群在卫生局当了一名小职员，负责井水消毒的实施和检查。他同“中青”的黄森等几位同志在惠福路民星新街租了一套房合租，有职业的出钱，失业的不用出，合起来过集体生活，达一年多。这期间，他们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经秘密渠道获得的党中央的文件（如“八一宣言”）和学习材料，还阅读大量的进步报刊和书籍。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国共第二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都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友群和这班朋友心向着党，向着延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和“中青”的同志们相继奔赴延安。他们中谁筹到路费谁先走。黄森、叶泽权、董世扬先出发了。与友群一起出发的是挚友刘公亮。公亮慈爱的母亲出钱支持儿子和友群两人的壮举。好友陈残云在黄沙车站送他两人上车。当时先后北上延安的广东青年不少。其后友群在青训班和延安时期熟悉并长期保持联系的广东青年有刘兆伦、田心、黄康云、莫燕忠、徐明、陈凌霄、王向立、周国瑾、谭彪、刘勇奴……等。后来，四会传开了：陈友群和陈德（志侠）、严庄（女）是当时四会全县北上延安的三位爱国革命青年。友群和刘公亮于12月到西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说服暂不去延安，而到泾阳县云阳镇。进入党领导的战时青年训练班第三期学习，编入第一大队。

安吴青训班成立于1937年十月，原设云阳镇，由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直接领导，朱德任名誉主任。班主任是冯文彬和胡乔木。1938年1月，因训练班迅速扩大，迁往安吴堡，从此简

称“安吴青训班”。安吴青训班是延安的前沿，来自各地的奔赴延安的青年，很大一部分途经西安，由八路军办事处先介绍到这里学习。青训班的工作曾得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关怀和赞扬。它的鼎盛时期是1938年，在这一年中办了十期，招收训练了上万名青年。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搞“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对青训班设置重重障碍，加以潼关以东铁路被日寇控制，学员大减。之后，青训班奉命陆续撤回延安。青训班先后培训了一万四千多名各族各界知识青年，他们结业后被输送到延安和各抗日前线、敌后根据地、友军以及抗战事业需要的地方，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友群于1938年1月结业后，被留在青训班教务处，在处长刘瑞龙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同年2月，友群入党，旋即被提为教务科科长。这期间，年仅十六、七岁的周国瑾、谭彪、刘勇奴三人到达西安，住进旅馆后遇到麻烦，便设法同已在青训班的友群取得联系。经组织同意，友群化装赶到西安，巧妙地把这三个已被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青年接出来，带往青训班，之后再送往延安。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岁青年来

说，青训班教务科长这副担子确实不轻。为了挑起担子，完成任务，友群不分日夜地拼命干，经常工作、学习到深夜。长期睡眠不足，引起严重的失眠症。同在青训班工作、比他大两岁的战友陈凌霄眼看他眼泡浮肿，面色发黄，劝他要注意休息；有时在工作间隙陪他在附近的树林里歇息，让他睡一阵；有时同他一起去逛集市，调剂一下精神。在当时热火朝天的氛围下，友群始终和所有的青年同志们一样，忘我地、乐观地勇往直前。青训班一年多的工作和生活的锻炼，对友群的一生影响很大，他时时怀念。1992年末，原青训班的一位老战友来到广州。期间，同解放后长期在广东工作的王宁、刘兆伦等相聚，开了一次亲切愉快的座谈会，共同回忆青训班的战斗岁月。友群时已定居广州，也参加座谈。会后，他乘兴写了赠于小山、刘兆伦两同志的《忆安吴》七言古体诗一首：

英才多少赴安吴，小米棉油衣着粗。
日啖甘泉乃苦水，夜眠宝榻是地铺。
当空解手望月厕，树野课研看山芜。
赤脚草鞋可安步，醪糟鸡蛋任尔沽。
纵谈世事争鸣热，万颗丹心向延都。

马列精研为救国，批评谬误免迷途。
完成学业上前线，练就功夫抗倭奴。
几代风云昂首过，于今无愧硬头颅。

(二)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央通知青训班分批撤回。到1940年，安吴青训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友群于1939年7月随第一批后撤的干部、学员回到他日夕思念的延安。他考入了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准备作更深入的学习。不久，因积劳成疾，他罹患重病，先后被送入中央干部休养所和中央医院。严重的心脏病和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他成了重病号。延安唯一的高级医生、跟随毛主席长征的傅连璋曾给他看病。当时的延安生活艰苦，缺医少药，友群的病情急转直下。青训班战友黄康云提着十只鸡蛋，从十几里外翻越沟沟坎坎去探望他，走出窑洞时忍不住流了眼泪。一位医生当面告诉友群：“没什么希望了。”周国瑾和刘勇奴去探望他时，他已被搬进了太平间。友群面临着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十几年后，他对妻子说，当时自己作了最坏的准备，为革命而死，心中

坦然。终于，他挣脱了死神的魔掌，活过来了，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爱护温暖着他，他自己的坚强意志支撑着他。他被重新安置在一间单人窑洞。当时延安干部的伙食很差，他病中却吃“小灶”，享受与中央委员同等的伙食标准，还有一位照顾他生活的“小鬼”，为他养了几只鸡。这样，整整四年，有限的药物和鸡蛋、鸡汤帮助他逐渐好起来。在卧病不起已一年多的1940年除夕之夜，友群独自在病床上口占一诗：“年年岁暮未思亲，党国为家战友伦。身虽卧病心犹健，体极羸羸志不泯。驱尔病魔除旧岁，成其好梦接新春。静养精神期来日，亲骑战马逐征尘。”题目是《除夕自勉》。

在健康基本恢复后，他立即要求工作。但工作刚刚一年，又因肺结核吐血而被送入中央干部疗养所再疗养了一年。同病魔的斗争，迫使他付出了整整五年的青春岁月。病愈后，他被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之后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到陇东参加土改。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时，他被分到中央前委（前敌委员会）政治部任科长，随机关撤出延安。毛主席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转山头那传奇性的几

个月，他就跟在这个队伍里。接着，他又调到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跟着以谢（觉哉）老为首的资深高龄的老同志及家属向晋绥迁移，任法委会机关秘书和支部副书记（谢老任书记）。一个少年老成的青年干部，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为老前辈服务，他既受教益也很有体会。作为后委的一个特殊单位，法委会从晋绥辗转河北的西柏坡。

1948年秋，他调到中央组织部，在廖志高、帅孟奇的领导下工作，任干部二科副科长。中央机关驻西柏坡和迁入北京的前后，他奉命主编了《干部问题汇编》一书。内容是摘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有关干部问题的言论。这是进城后内部发行的首批图书之一，也是新中国初期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内部读物之一。

1949年3月，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北京。不久，友群也随中央组织部进京，工作、生活都在槐里胡同。五十年代在西单北大街耸立的中央组织部大楼就是在槐里胡同附近建起来的。

(三)

1949年10月，全国人民欢呼新中国成立。

同年11月，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找友群谈话。安部长说：“朱总司令要我替他在中组部内挑选一个秘书。部里已决定要你去。你不必去东北局参加会议了，部里另派人去。”中组部原派龚子荣和友群参加东北局的一个会议，车票已买好。没想到要调动工作，而且要立即去报到。

第二天晚上，友群随安部长到中南海，参加了朱总司令主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安子文把他介绍给朱总司令和各位委员。

得知要到朱总身边工作时，友群的心情有些紧张，主要是感到自己的水平同职务要求之间差距太大，怕工作做不好，辜负组织上的期望。可是再一想，他在青训班和延安时就听过总司令的讲话，四十年代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读过朱总《纪念母亲》的文章和在“七大”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1946年延安举行了祝贺朱德六十寿辰的盛大活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写了祝词、贺信，《解放日报》还出了两版专刊；长期以来，朱总关心爱护干部的热忱，严词

斥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时的凛然正气，以及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风度，这些都是他所熟知的，印象很深。能在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身边工作，一定能得到极大教益。他决心接受任命，并暗暗鼓励自己：一定要兢兢业业地把工作做好。那年他三十一岁。

到职不多天，友群住进了中南海永福堂朱总的住处。这是一处清静的三合院。北屋是三间正房，西头一间是朱总的办公室、书房兼客厅，东头一间是朱总和夫人康克清的卧室；当中一间拦成两截，里边做贮藏室，外边做饭厅。西厢房是会议室，东厢房隔成三小间，友群和另两位秘书各占一间，办公兼住宿。

搬进中南海那天，朱总同友群谈话，交代任务。朱总说：“近来工作较多，要调你来帮点忙，协助做些工作。阅读文件时发现好的经验或问题要提出来，要对有关的一些文稿进行整理……，总之，做些应办能办之事，相信你是能做好的。”

作为政治秘书，友群每天要花相当时间阅读文件、电报。朱总向机要秘书交代，凡是送朱总阅读的文电，除注明由他亲拆的之外，均可交政治秘书阅读，以提高知情度。朱总及时

把中央的精神传达给秘书，鼓励秘书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央开重要会议，形成文件前，也将要点讲给秘书听，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朱总找国务院各部部长谈话了解情况时，都叫秘书参加。朱总还组织秘书学习，曾指定一些经济理论书籍，同秘书一起学习讨论，并提倡结合实际，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一次，在同友群和何均两位秘书一起读完一本外国经济理论著作开展讨论时，朱总谈了我国应建立中央、省（市）、县、乡四级财政的主张，随后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提出这一建议，但未被采纳。多年后友群说：“朱总的这一正确主张，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步得到实现，可惜了。”朱总对中央正在研究的一些战略性问题，也同秘书讨论，听取意见。他曾问友群：“你看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鼓励他大胆分析，提出看法。

建国初期，中央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时，决定由朱德同志兼任中央纪委书记。友群也随之兼任中央纪委秘书。他的主要工作，是参加中纪委的会议，参与研究、草拟讲话和文件，根据朱总的指示调查一些重大纪检案件等。对纪检工作，朱总反复强调，必须严肃慎重、分

清是非轻重、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搞错。友群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精神和朱总的指示，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出过偏差。

1952年“三反”运动中，一位高级干部的严重错误被揭出来，报到中纪委。朱总派友群深入做全面调查。出发前给原则，调查后帮助据实研究，经中纪委讨论，作出了既严肃认真又实事求是的处理，这位曾立过功的高级干部受到撤职处分。他经过若干年到基层反省、磨练后，被重新调回领导岗位，并作出了新的成绩。多年后，友群谈到当年工作的体会时说：

“总司令是从来不武断地评价或批评一个干部的，更没有整过哪一个人的。他一生光明磊落，可昭日月。”

五十年代初，党、政、军、群各方面的全国性大会邀请（或中央安排）朱总司令出席讲话的不少。每次讲话前都是朱总口授原则和要点，嘱友群写成讲话稿。当时中央领导核心是毛、刘、周、朱、任五大书记。友群知道，朱总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代表们都将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多数还公开发表。草拟整理讲话稿的责任特别重。为此他往往绞尽脑

汁，反复琢磨，夜不成寐，直到经朱总审改定稿为止。1950年5月朱德同志在中央直属系统各级党的纪检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经毛主席批示发至全国各级党委。针对建国初期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引致违纪的现象，朱德在讲话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人物，即使你作得最好，贡献最大，也不过只是作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我们共产党人……要求自己比要求别人要严格一些，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这段话曾被反复传达和引用。

1956年，朱总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前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前去柏林，出席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皮克总统的七十寿辰庆典；会后应邀访问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蒙古等国。友群作为工作人员之一随团出访。回国后他与廖盖隆一起，根据朱总的指示，整理了朱德同志出访苏联、东欧等七国的日记，报送党中央。

友群在朱总身边的工作，每每涉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因此他十分注意严格保密和严守纪律。1953年随朱总视察广东时，他尽管思念隔别十七年的母亲（当时她也住在广州），

却没有回家，也没有接母亲到招待所见面，只是在朱总离开广州的前一天，约他的弟弟陪同母亲到老战友叶泽权家中，自己则请了几小时的假到叶泽权家同母亲作短暂的聚面。友群在中南海工作期间，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真实职务告诉过家里，他家里只知道他在“中央机关”工作，同他通信则只须写“北京××信箱”。

朱总对友群高度信任，关怀备至。1951年初，朱总肺炎初愈，专家建议他到南方疗养一段时间。恰巧这时友群治疗心脏病后出院，医嘱作短期休息。朱总得知，便嘱友群一起启程到杭州，疗养了三个月，使他得以顺利康复。

1961年冬，友群（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到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抽空去看望朱总。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朱总留吃晚饭，饭桌上摆的是一碟青菜，一碟豆腐，一碗素汤，还有几片粉蒸肉。朱总把粉蒸肉推到友群面前要他吃。他见就这么几片肉，怎舍得吃？便又推到朱总跟前：“还是请总司令和康大姐吃。我现在住北京饭店，有肉吃的。”康大姐对他说：“这是老总为你加的菜，你得吃呀。”友群只好夹了一片肉。总司令身为党的副主席、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既与人民同甘共苦，又这样

关心体贴下属，为他加菜，友群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激动。

尽管相处八年之久，友群从未向总司令提过什么个人要求。他随朱总到各地视察或出国访问，遇到照相时，总是尽量站到后边，避开镜头。直到1963年，他才第一次提了要求。这次是他遵医嘱到北京查病，再次去看望首长。朱总照例留饭。闲谈中友群提出，希望总司令给他写张字留作纪念。总司令慨然应允，问他写什么内容好。他说，很喜欢总司令的《出太行》诗。朱总便进入书房，即席挥毫，一口气写下了“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俦”这首气势磅礴的七绝。翌年再赴京时，朱总又赠他墨宝。这次写的是《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朱总自幼临贴习字，曾临习黄山谷（庭坚），书法在党内诸老中是有名的。这两件墨宝，友群均送荣宝斋装裱，视为传家之宝。

（四）

1957年，中央先后抽调一些在机关工作的年轻干部到基层、到实际工作中经受锻炼。友

群也于同年秋奉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友群以为，能到人才荟萃、工作先进而又环境复杂的上海去工作，机会难得。他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告别八年来谆谆教导他的朱总司令，告别中南海，走上新的岗位。1958年，在毛主席、党中央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上下热火朝天。凭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信念，友群和全区干部群众一起，在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大干。往往是夜里一两点才回家，早晨八点准时上班，有时后半夜还要起来接电话，谈工作。一次，在车间参加炼钢时，钢水溅伤了脚背，不得不住院治疗了半个月。1959年，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等问题及其恶果开始露头。上海的肉、蛋、鱼等副食品买不到了，棉布、棉织品也买不到，党员还捐布票，糖果、点心更不用问了。那时，广大干部、群众仍然响应党的号召，廉洁自律，勒紧裤带，以极大的热情坚持工作与生产。

1961年5月，华东局为支持“重灾区”的山东，从上海抽出八名干部，由友群率领调去支援青岛。友群任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

记张敬焘也是一年前从上海调去的。那时的青岛，大部分干部患肝炎和浮肿，病重的住院，较轻的带病坚守岗位。城市居民粮食供应以粗粮（地瓜干和玉米面）为主，青岛附近的几个县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友群在市区亲眼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爬到树上摘嫩叶充饥，在郊区看到六个老人、小孩艰难地拉一把犁在犁地（耕畜都饿死了）。友群面对解放以来未曾有过的景象，心里很难受。他苦思苦想，为什么国家和人民竟遭到如此严重的挫折？他当时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根本的原因和教训。他唯有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工作，与人民群众共度难关。1963年，全国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友群兼任副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他努力执行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狠抓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与王云九副市长一起，研究整个市政建设的长远规划，同时以改善市南区前海沿一带的市政设施为突破口，加强市政建设。他们的目标是：在原来很有特色的青岛市容及市政建设的基础上，争取在若干年内把青岛建成“东方日内瓦”式的美丽城市。在青岛工作期间，友群的心脏病先后两次复发，因而住院和疗养了一段

时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和青岛市的大批领导干部一样遭到了严重的迫害，他们的市政建设规划被诬为“修正主义的城建路线”。他被批斗、挂牌、游街、关押，还因曾任朱德的秘书而被加扣“黑司令的黑秀才”帽子，被多次抄家。1973年被“结合”任市革委核心组成员仅半年多，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友群又被第二次打倒，成为在山东全省范围广播、批斗的两个打倒对象之一（另一位是原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从此一切正常待遇被剥夺，工资大部被扣发，连电话也撤了，软禁在家中达两年多。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消息传来，友群悲恸不已，申请去京参加追悼会，被无理拒绝。毛主席逝世后，虽被允许赴青岛灵堂参加吊唁，但他被夹在市民的吊唁队伍中，前前后后布满民兵，如临大敌一般，……。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友群仍迟迟不得解放，不得结论。被软禁期间，他与社会、与同志们的关系完全被隔绝。他在痛苦中读了一百多本书，思考了很多问题，有时也写一些只给自己和妻子看的小诗。其中作于1977年7月的《感怀》，多少可以反映出他当时的抑郁、愤

慨之情：

多年临海滨，身如涸辙鲋。
久居现代城，行多坎坷路。
光明磊落人，雪压霜欺侮。
贤者没蒿莱，敢邀尧日护？

(五)

1976年10月，全国人民欣喜若狂地庆祝“四人帮”垮台，“文革”十年浩劫终告结束。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情，是以加倍努力的工作来补偿失去的十年。1977年春，友群收到《广东文艺》编辑部 and 老战友、作家陈残云分别发来的约稿信，说刚刚复刊的《广东文艺》正在组织诗文纪念朱德委员长逝世一周年，约他写文章。友群很明白，约稿信反映了人民的心愿。这时，友群在青岛被两次打倒的冤案毫无平反的消息，处境依然恶劣。发表文章会不会引来麻烦？他考虑再三，毅然应约。他对妻子说，司马迁下狱受刑还撰写《史记》，我怎不能写？他们剥夺了我工作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但思想和记忆仍在我脑子里，笔仍在我的手里嘛。于是，他翻阅家中一切有关的书籍和资料，打开记忆之门，奋笔疾

书，写出了一万五千字的《永远怀念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一文。《广东文艺》把它刊登在1977年第七期的卷首。香港《大公报》随即转载了文中的《（朱德）和广东人民心连心》部分。接着，他应上海《文汇报》和《人民文学》等报刊之约，陆续写了一批缅怀朱总司令的文章。

友群一再提出重新工作的要求。对于他，获得工作岗位甚至比文革以来自己冤案的平反更为迫切，因为这时他已59岁，时不我待啊！要求多次没有结果。1978年初，他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胡耀邦部长，申诉受迫害的情况，要求先分配工作。不久，按中央组织部通过山东省委转下来的通知，友群全家于同年4月回到首都北京。中央组织部很快安排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成立的革命史组，当组长。这个组的任务是负责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等已故老一辈革命家生平思想和文献的编辑、研究工作。1979年他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室务委员兼朱德著作生平研究组组长。1984年中央任命他为中央文献研究室顾问，他在文献室的10年，一直主持朱德著作、生平的编研工作，直到离休。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党中央的部委之一，担负着编辑、研究、出版党的历史文献和老一辈革命家著作、传记的重任。主要设有毛组、周组、朱组、邓组和综合组；刘少奇同志冤案平反昭雪后才设刘组。友群除参加集体领导外，主要是组织领导朱组的同志们为出版《朱德选集》、《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等书进行大量的调查访问、收集资料和编辑研究工作。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段期间，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抢救史料了。他们马不停蹄地分别向数10名老同志（如建党初期的罗章龙、李维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会师时期的何长工、肖克……等），进行深入的调查采访，搜集和核实大量有关史料。他们还分工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有关史料和文章进行核实、修改和补充。

为了早出书，出好书，友群和朱组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默默耕耘。有时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也到办公室去。1982年，许多当年曾在安吴青训班学习和工作的老同志相约从全国各地赶到西安集合，重访安吴堡和延安，以纪念安吴青训班创立45周年。友群多次接到通知和催促的电话。当年满腔热血奔赴延安的小伙子们都

已七老八十了，许多人也已几十年没见面了。对这次大家盼望已久的难得聚会，因赶编“朱选”，分不开身，他毫不犹豫地“请假”了。

作为集体奋斗的初步成果，《朱德选集》和《朱德年谱》分别在1983年8月和1986年12月出版了。由于《朱德传》需要在完成前两部著作的基础上才能开始撰写，所以直到1993年8月才出版。友群因年事已高，只参加了这部著作的前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80年代，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传记尚在策划和研究期间，解放军出版社为了满足全民、全军读者的强烈愿望，决定分集出版《解放军将领传》，着重介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过程中有影响的高级将领的生平和主要军事活动。友群应邀撰写了朱德传略，全文五万字，刊于1984年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老师在长征中》一书，书中首篇《三军过后尽开颜——记长征中的朱德总司令》一文也由友群撰写。

这一期间，友群还为报刊和出版社写了一些专题文章，如《总司令的经济观》、《朱德与兰花》、《熏陶教诲长铭感——在朱德身边当秘书》……等；他还与黄华（原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曾任朱德秘书）合作撰写了《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学习朱德同志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精神》一文，1984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

在文献工作中，友群一向坚持严谨、负责、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和敢于突破偏见的原则。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他非常认真。例如，关于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形成过程及其首倡者问题，他作了长时间的调查、考证、阅档、查阅有关人物的历史著作、研读朱德早年读书的眉批和军事活动的记载以及访问有关当事人等，有根有据地提出并坚持：十六字诀是朱德首倡的。为了坚持史实，坚持真理，即使遭到非议或打击，他也无愧无悔。他奉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时刻鞭策自己。这是友群尊崇实践朱总司令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风格的一个例证。

友群的生活一向俭朴，不嗜烟酒。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自少喜欢打球，爱看球赛，是个球迷。为了看世界杯决赛和奥运会足球决赛的现场直播，他不仅半夜起床打开电视机。他工

作起来则很认真，很严肃。他主持的会议必定准时开会，与会者也少有迟到的。他不善开玩笑，但与老朋友相聚时，也常来几句幽默。老来喜交青年朋友，很善谈，青年朋友也喜欢他。遇到高兴、愤慨或感伤时，爱作首打油诗。离休后，时刻关注国家大事与世界风云。在年青人的眼里，他属于“不用扬鞭自奋蹄”一类的老干部。

友群曾说，他是秘书界的老兵。1988年5月，他接受上海《秘书》杂志主编的采访，随即应邀参加该杂志在烟台举行的秘书工作改革研讨会。会上，他以“退伍兵”的身份向来自16个省、市、区的与会者回忆了朱总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对秘书的培养教导，介绍了他多年做秘书工作的体会。他体会的要点是：（一）要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二）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尽可能广泛的知识；（三）要正确领会贯彻领导意图；（四）要尽可能地为领导拾遗补缺；（五）要洁身自爱，廉洁奉公，甘当无名英雄；（六）要遵守纪律。会后，应与会者的要求，《秘书》杂志1989年第2、3期连载了他撰写的《在朱德身边当秘书》一文。

1989年初，经组织批准，友群正式离休，并迁广州定居。

友群常说：他能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8年，备受关注和教导，后来又得以11年时间从事朱德著作和生平思想的编研工作，是有幸的。他写的古体诗《敬怀朱德总司令》，可以说凝聚了他对朱总的伟大功勋和高风亮节的切身感受以及他对朱总的高度崇敬之情。诗如下：

巍巍峻岭一苍松，党国无勋著奇功。
挥戈直指三山倒，竭诚鼎助毛泽东。
朱总大名垂宇宙，党指挥枪贯始终。
功丰绩伟归群众，德高不显矢为公。
万险千艰等闲事，污云浊雾仍从容。
宽宏大度如江海，交心献胆真英雄。
循循善诱培桃李，赫赫声威斥蝥虫。
亲干爱群群益爱，扶善除恶人尊崇。
沥血呕心创大业，推诚相见聚群龙。
磅礴诗文传天下，毕生勤学务精通。
忠于马列忠于党，忠于十亿主人翁。
四妖未除含恨去，革命到底遗言中。
熏陶教诲长铭感，嘱示子孙步高风。

※ ※ ※ ※ ※

1996年初冬，经专家确诊，友群罹患胰腺

癌症，晚期，大面积扩散，医治无效，于1997年1月11日在广州不幸逝世。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在友群病危时专程到广州慰问。中央组织部批准骨灰安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经中组部审定的《陈友群同志生平》中对友群一生的工作和思想作风给予了评价，并指出：（他）“深得朱德同志的信任和勩勉。”“他是当前我国研究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知名专家。”

友群生长在广东四会，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是西江的儿子，是四会的人民哺育了他，送他走上革命道路。他常以未能直接为家乡人民办事为憾。1976年夏，因老母病重，他请假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在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人雍文涛的关切与安排下，四会县委热情地接待他。他过绥江回姚沙村省亲时，用四会话同渡船的艄公交谈，艄公当他是“知青的家长”。他高兴地对随行的子女说：“我的家乡话还没有完全忘记哩。”他看望了老母，会晤了县委领导人，还就这次回乡的见闻写了热情洋溢的诗。他特别怀念自己的母校四会中学和当年的严元章校长。他感到高兴的是，改革开放后，他能同久别的严校长相聚于北京；自80年代

起，他与母校的历任校长都有密切联系，还回母校参加过校庆活动。1993年11月25日四会撤县建市。他应市委的邀请，与刘田夫、梁威林、梁嘉等老同志一起回四会参加市委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自己亲爱的家乡。

来文撰写过程中承黄森、刘兆伦、陈凌霄、董世娣、莫燕忠、周国瑾、谢启尧等同志帮助提供或核实史料，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是陈友群的夫人，原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打击违法行为 促进经济发展

——四会县“三反”、“五反”运动的回顾

冼鸿雄

1949年10月16日，四会县全境解放了。随即建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实行暂时的军事管制。接着在上级党政的关怀和帮助下，建立了中共四会县委员会和四会县人民政府。县委、县府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开展清匪反霸和“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和不法商人、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促进了经济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企业得到了新的繁荣条件，市场私营业牌价，根据国营的合理价格为标准，部分商品价格下降了，工厂产品质量提高了，说明了“三反”、“五反”运动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反”、“五反”运动，是四会县解放初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认真地回顾这场运动的始末，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加快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是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的。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尚未得到彻底的肃清，他们有的躲在深山老林，伺机反扑；有的则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活动，组织所谓“救国军”，暗地里或公开地与我人民解放军负隅顽抗，不择手段地暗杀我党政干部，设障拦路抢劫人们的财物，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从旧基层过来的一些旧职人员怀疑和敌视共产党，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到处放厥词、讲怪话、煽阴风、点鬼火，千方百计地离间共产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不法商人和资本家，大搞资本主义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还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在他们的工厂里，生产时偷工减料，进行偷税漏税，甚至制造假、伪、劣的产品，直接坑害百姓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由于

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接收过来的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个通货贬值、物价飞涨、百孔千疮的一个烂摊子。因此，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这些都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解放初期，四会和全国的形势一样，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公开的股匪、散匪盘踞在偏僻的山区或隐藏在交通要道杀人抢劫，美蒋匪帮还派遣特务，潜回县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进行武装暴动。如匪首张建中发展地下组织，到处杀人放火、放毒。不法的资本家和商人也乘机在工厂和企业里制造所谓“三停”（即停工、停薪、停伙），妄图引发工人对共产党的不满，重建他们昔日压迫、剥削工人的天下。

为了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国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跟着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的“三反”、“五反”运动。四会县委、县人民政府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发动和组织全县人民，密切配合

中国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清剿了盘踞在四会广宁边缘地区一带的股匪、散匪1000多名，缴获长短枪2000多支；举办土匪、特务、反动党团教育班，对他们进行登记自新、集训、分化。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效地安定了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秩序。积极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各种削弱共产党领导和违法的行为，粉碎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证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三反”、“五反”运动的始末。

早在1951年10月，毛主席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就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政协全国委员会根据毛主席的号召指出：贪污浪费是增产节约的大敌，而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温床，不坚决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增产节约运动就不能顺利开展”。

解放初期，资本主义商业，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扶持下，有了相当的发展，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也逐年增高。然而，他们并不满足

自己所取得的既得利益，而恩将仇报，采取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的经济情报等手段，向工人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妄图窃取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达到其变天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为了及时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证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和发动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使不法商人和资本家陷入了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各种卑鄙的手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耻的闲言，被工人阶级用事实驳得体无完肤。同时工人还通过算账对比、查收入、查逃避资金，穷追猛打，使资本家抽走资金的违法行为受到了应有的制裁，使商业和工厂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支援抗美援朝的力量，有力地保证了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会县是在1952年1月，在县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开展“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

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①运动初期，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揭发出来的问题很多，归纳起来有如下：一、功臣自居，怕艰苦；二、自由松散，大饮大食；三、对上不满，对下压制；四、丧失立场，敌我不分；五、散布谣言，破坏运动；六、抛出“三停”，制造混乱。为了使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纯洁革命队伍，提高干部思想、政治的素质和工作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县委和县府动员全县党、政、军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县人民，坚决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在全县范围内，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检举揭发我们干部队伍中的种种不良倾向和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手段来腐蚀我们干部，破坏经济建设的阴谋。当时采取的方法是：一是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二是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活动；三是组织工人与不法商人和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四是边揭发、边落实政策，边处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坏分子。这样，很快地

1、摘自1996年10月，四会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的《四会县志》的“大事记”

把运动推向高潮。人们把“三反”的对象称之为“三害”，把“五反”的对象称之为“五害”；或叫‘小老虎’、‘大老虎’，形成了一个捉“小老虎”、打“大老虎”的人民战争，穷追猛打，任凭他们手段如何变幻，都成为瓮中之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对“三害”的斗争，改变了对投机取巧，钻营集利、盗窃国家资财是“聪明能干、有本领”的错误看法，进一步提高了干部的思想和政治的素质。工人起来揭发不法资本家抛出的“三停”的阴谋，迫使他们恢复营业和生产。彻底清除了不法资本家和商人多年来惯施的“五毒”恶习，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共处理有贪污和不法行为的有226人，把在革命队伍中的不纯分子清除出去了，纯洁了革命队伍；端正了干部的思想作风。经过“三反”运动的学习，同志们思想提高了一步，大部分同志安心工作，积极肯干；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大部分商品价格下降了1%至5%不等，工厂产品质量一般地提

高了20%至30%左右”；②加强了抗美援朝的力量，保证了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不断打击不法行为、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解放初期，我党正集中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社会上的不法商人和资本家却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拉拢、腐蚀我们干部，破坏生产，大肆向工人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企图破坏我国经济建设，达到他们变天的目的。然而，我党洞察秋毫，及时地在党政机关和社会上开展“三反”、“五反”的群众运动，识破他们的政治阴谋，粉碎了他们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

从“三反”、“五反”运动中，揭示了一个不断推动社会前进的道理：不断打击不法行为，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保证之一。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又将如

①摘自四会市档案馆，全宗号23，四会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揭露和处理犯错误干部的违法材料。”

②摘自四会县人民委员会，四会县志编写委员会于1962年编写的《四会县志》中第一章《十年巨变》。

何呢？

一、必须坚持“三讲”。“三讲”不但今天要讲，将来也要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不希望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总是利用他们在科技与经济上的优势，千方百计地企图遏制我们，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采取腐蚀、拉拢、渗透等卑鄙可耻手段，以达到“西化”、“分化”我国的目的。只有通过“三讲”，并以整风精神把“三讲”教育坚持下去，才能不断提高我们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政治免疫力和应变能力。在工作的实践中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非科学的，反科学的；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反对。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

己首先不做。做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心不贪，身不懒，嘴不馋，手不伸”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坚持清政廉政，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为革命多作贡献。

二、坚决严惩干部队伍中贪污腐化的变质分子。这些人虽然在我们干部队伍中占极少数，然而他们的不法行为，却严重地影响我党的形象和凝聚力，削弱了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党群的鱼水关系。正所谓“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汤”。只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党纪国法为准绳，严惩他们，把他们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纯洁我们的革命队伍，才能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把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严肃处理社会上的假、伪、劣商品。当前市场上出现一些以假乱真、以劣充好商品，这些东西与50年代初不法资本家偷工减料生产假冒的商品是一路货色。这直接或间接地坑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声誉。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鼓励所有生产厂商，要生产货真价实的产品；努力去争创名牌产品，投放市场；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深入市场调查研究，一经发现假、伪、

劣商品，要及时严肃处理，不但要没收假、伪、劣商品，而且要追究生产者的责任，减少或杜绝假、伪、劣商品在市场的流通，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中共四会县组织建设的作用与问题
(1956年下半年—1965年底)

黎国荣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四会县组织经受了“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四清”等政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并在这些运动中不断调整、充实、教育、提高，壮大发展，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起到了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的作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回眸总结这段党建历史，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资政育人的作用。

一、党的建设

党的建设包括组织、政治、思想、作风等主要内容，中共四会县委（1993年撤县设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根据中央和上级党

委的指示，结合本县的实际情况，对党的建设抓了如下工作。

（一）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基础。打好这个基础，就是要抓好发展党员，建设好党支部，建立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加强对党员管理教育，提高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以便更好地组织和带领党员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积极发展党员

党员是构成党组织的分子。为了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四会县委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慎重挑选，积极培养，大量大胆发展”的建党方针和华南分局“党委重视，全党动手，组织部门具体管理”的指示，积极发展党员。在工作中，四会县委和各基层党组织领导成员，按上级党委的要求，深入到革命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中去，民主挑选建党对象，并把他们放到各运动中去锻炼培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把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到组织中来。这时期发展党员有两大特点：前4

年快而多（注1），1956年下半年至1961年初，全县党员发展到4933名，增加1366名，平均每年约增342名；后4年发展党员慢而少（注2），1962年至1965年，由于进行整顿党组织，对党员重新登记，取消定指标、定任务的做法，严格按党章发展党员，步子放慢了，此时只吸收了329名，平均每年约80名。至1965年底，全县共有党员5262人，其中农村3946人，城镇为1316人，党员分布日趋合理。党员的发展，有效地增强了党的领导力量。

（2）调整、巩固和发展基层党组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四会与广宁再次合县，后又分县，期间并乡并社并队和行业变革不少。为适应这一形势变化，四会县委及时对基层党组织进行调整、巩固、教育提高工作。1956年至1958年10月，先由1镇5个区党委改设1镇25个乡党总支。1958年10月后把原区党委和乡总支并为1镇14个大乡党委；后来又把镇乡党委合并为1镇5个公社党委。1961年4月广四分县后，四会成立15个公社和一个镇，分别成立党

注1、注2：1958年10月至1961年4月四会、广宁合县，故有前4后4年之分。

委；同年调整建立19个党总支和340个党支部。其中：农村205个党支部，城镇135个党支部。此后，为了适应革命、生产斗争的需要，县委又一次对基层党组织进行调整。至1965年底统计，全县建立14个党委（撤销水运公社党委）、一个党组、34个党总支和281个党支部。在调整过程中，县委领导和县委组织部精心选配好各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公社党委和各总支选配好党支部书记，同时协助订好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生活制度。在各政治运动中，根据省、地委的部署，组织力量，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风。通过整风，逐步使其成为政治思想好、执行政策好、工作作风好、团结协作好、联系群众好的先进集体。

(3)加强县委工作机构的建设

县委工作机构是县委开展工作、贯彻上级党委指示的参谋作战单位，是为县委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管理好党的基层组织、党员教育和各项公务，协助县委动员组织党员群众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四会县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对原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的机

构保持不变。期间，先后把纪律检查委员会改设监察委员会，1959年将监察委员会改称政法委员会，同年12月又改称政法公安部，1963年又复称政法委员会。对原合作部改称农村部；把原财贸部改称财贸政治部。与此同时，增设了农业办公室、党校、直属机关党委。对统战部、工交部和文教卫生部分别撤销或合并。县委对这些机构的调整和建立都十分重视。在建立、调整的基础上，选派县委常委、县委委员或德才兼备的优秀党员担任各机构主要领导，选调了一批优秀党团员充实机构力量。每个机构少则4、5人，多者10余人。这些机构的建立、调整和完善，对于加强各级党组织、党员的管理和各线工作的领导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4）召开党代表会议，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代表会议是党内民主生活的基本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就能较好客观地听取各方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1956年5月和1961年10月，四会县委按上级党委的指示要求，在四会镇先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四会县第一、第

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由各基层党组织民主选举产生。这两次大会的正式代表分别为169名、289名；列席代表分别为45名、147名。大会分别学习贯彻大会工作报告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农业发展纲要40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提出进一步贯彻落实“六十条”；决定开展群众性的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同时提出并通过我县《关于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建设》等项决议。大会民主选举了以韩志洲为第一书记的第一、二届委员会；其委员人数分别为23名、25名；候补委员人数分别为4名、6名。同时民主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党代会结束后，每年召开1—2次县委委员全体（扩大）会议，公社党委、各党总支、党支部决定重大事情，也召开党员大会研究通过，贯彻执行。这些党代表会议的召开，为完善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制度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思想建设

政治思想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要一环。四会县委根据当时的形势，针对党内的实情，进

行了三方面教育。

(1) 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为了提高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前段，四会县委主要组织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论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段，大力开展全党全民学习毛主席著作（下简称毛著）活动。在学习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要求党员干部通读“毛著”。为了有效组织领导开展活动，加强指导，县委成立学习“毛著”办公室，协调各单位上好辅导课。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交流学习经验，表彰先进，把学“毛著”活动不断引向深入。通过学习，广大党员较好地认识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普遍真理，运用革命理论指导工作，不断推动革命和生产向前发展。

(2) 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

党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也是激励

党员为之奋斗的强大动力。为此，四会县委从加强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入手，因为它是每个党员行动的指南。于是县委以党校、公社以文化站、大队以文化室为阵地，有计划组织党员认真学习“八大”通过的党章、决议和有关文件资料。据1965年不完全统计，县、公社、大队三级和各线总支和党支部先后办学习班250多期，参加学习的党员12510多人（次）。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对党的纲领、性质、宗旨、义务、权利、组织原则、奋斗目标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提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的决心。他们深深认识到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体党员和人民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分光荣。大家表示立壮志鼓干劲，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奋斗终生。

（3）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必修之课。四会县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指示各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党的“八大”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学习中强调理论

联系实际，对党员进行“三对比”——新社会与旧社会对比；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比；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比教育。同时组织党员参加各政治运动，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受锻炼，从中体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10年来，四会县委先后组织党员参加阶级斗争教育的有63540多人（次），其中县级的有12090多人（次），公社、大队和各条战线的有32600多人（次）。通过学习实践，广大党员的阶级斗争观念大大加强，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能分清敌友，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三）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作风包括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作风。党风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党能否获得广大人民的信任、支持，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乃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四会县委针对党员的存在问题，主要开展三方面活动。

（1）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作风的教育活动

调查研究是克服官僚主义、盲目指挥生产的好办法。为此，四会县委首先组织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论党的工作作风》、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等论述，武装
头脑，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然后组织县委、
县府领导成员深入农村、工厂蹲点，调查研
究，了解民情，总结经验，指导全面。县委副
书记梁继成深入迳口大队血吸虫疫区，与疫区
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三同”中，他
不怕艰苦调查血吸虫病情况，了解疫区群众生
活困难。之后，他一面协调迳口党委和有部门
建立医疗站，组织医务人员防治血吸虫病；
一面写成调查报告送县、地、省有关部门，受
到干群交口称赞。在县委县府领导的影响下，
各级党员干部纷纷下厂下村蹲点，与工农群众
“三同”，了解工农生活和生产，调查研究蔚
然成风，这对于推动革命和生产都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2）开展艰苦奋斗作风的教育活动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优良革命传统作风
之一。四会县对这一作风教育十分重视。他们
的做法是：先是大力宣传艰苦奋斗作风的重大
意义，讲述在战争年代革命前辈与敌人进行的
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在工作、生活中发扬艰苦奋

斗精神夺取胜利的事迹，激励党员干部学习前辈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并以他们为榜样，做好建设新中国的各项工作。其次，县委领导成员身先士卒带头实践。那时，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党员干部都经常背起行李，骑上单车，有时步行到农村、工厂，与工农群众同甘共苦，把艰苦奋斗作为自己锻炼工作作风的试金石，在各自的岗位上流大汗，创大业，作奉献，开展科学实验，发展工农业经济。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使四会山河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3）开展联系群众作风的教育活动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群关系的好与坏，是直接影响到革命、建设成功与否的大问题。1958年以后，四会个别地方出现党员干部对社员捆绑、打骂、体罚等不良现象，造成党群关系紧张。四会县委对此类事件非常重视。他们在派出工作组深入调查事件真相，严肃处理肇事者的同时，大力开展全党联系群众作风教育活动。在活动中，他们一面组织党员学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著，列举党在延安抗日时遇到困难，与人民同谋共策，

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生活困难的事迹教育党员；一面以批评本县发生打骂体罚社员等不良作风，来鞭挞党员，同时责令有关党员干部上门，公开向有关群众赔礼道歉，改善党群关系。通过教育活动，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对联系群众作风重要性认识。此后，广大党员干部不仅改变了粗暴对待群众的做法，而且逐步学会了办事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进而，联系群众作风不断得到发展，党群关系日益密切。

（四）党的中坚作用

四会党组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不断得到调整、巩固、完善和发展，党员不断得到教育提高，因此他们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起到了中流砥柱和先锋模范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1）在革命斗争中起先锋作用

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其失败的。他们随时都会从思想到行动，或明或暗对各行各业生产人员进行攻击、拉拢腐蚀。县委为了使社会安定，顺利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号召党员

提高警觉，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站在斗争前列与其斗争。经过培养教育和“三大改造”斗争洗礼的广大党员不论在“三反”、“五反”斗争中，还是在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中，他们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其时，阶级敌人乘“三年困难”之机，挖空心思进行造谣惑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千方百计破坏工农业生产建设，破坏农贸市场秩序，并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散布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干部群众。广大党员奋起揭发、斗争，自觉抵制其腐朽思想侵袭，清除其毒害，起到了先锋作用。芙蓉的不法分子说什么“治山治水，越治越衰”，妄图破坏农业生产建设。该队党支部成员深入调查，掌握证据，与其斗争。结果，团结了群众，治山治水，整治低产田，不断取得进步，成了南方的“大寨”，其事迹远播省内外。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受到人们的称赞，为社员群众树立了榜样。

(2) 在生产斗争中起模范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四会县为了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提高人民的生活和健康

水平，有计划开展治水、治田、治虫（血吸虫）等重大工程建设。县委指示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以战斗的姿态、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把这些工程搞好。各基层党组织按县委的指示，组织带领党员群众积极投入战斗。他们在县委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以绥江、龙江两岸和大沙、迳口、大旺、清塘地区为主战场，于全县范围内大打兴修水利、整治低产田、消灭血吸虫病的人民战争。广大党员特别是在主战场的共产党员，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社员在“三治”的工地上安营扎寨，顶烈日、冒风雨，筑堤挖渠、排除积水、整治低产田、查治血吸虫病，夜以继日工作。迳口吴东就是千百党员中的一个。他为了做好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不怕苦，不怕血吸虫病侵染，踏遍了迳口草塘的山山水水。在草塘低洼处有一口丈多深的水塘，他冒着深秋的寒冷，一次又一次潜入水底，摸清实情，制订治理草塘方案，为整治草塘消灭血吸虫病发展生产提供可靠依据。人们称他是“不怕艰苦，不怕死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广大党员事事吃苦在先，艰苦工作在前，团结群众，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经过10年的持续奋斗，先后修筑防洪大堤140多公里和山

塘水库200多宗、有效抵御洪水的侵袭和旱魔的干扰，开挖水渠近300公里，兴建电排站53座，排除了迳口、大旺草塘和绥江、龙江两岸内壟的积水，大大改造洪水为害和血吸虫滋生环境；整治积水农田和山坑低产田17多万亩，为发展农业生产和消灭血吸虫病创造了良好条件。

(3) 在科学实验中起带头作用

科学实验是发展生产的重要手段。四会县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根据上级党委政府的部署，指示各基层党组织团结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工农群众，广泛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以科学技术促进工农业经济发展。在农业方面，各公社党委大力推广农业“八字宪法”、积极开展水稻和其它农作物的高产试验。那时，从公社书记到一般党员都搞丰产垌、高产试验田。通过科学实验，树立样板，推动全局，不断提高农业产量。1965年稻谷总产达到123845吨，亩产量215公斤，分别比1956年增加1.89倍和1.9倍。高产试验田总产量达2168多吨，平均亩产671公斤，超《农业发展纲要》400公斤要求的67%。在工业方面：各工厂以党支部为核

心，组织党员与科技人员、工人一起，进行更新设备、改革工艺流程，开展试制新产品的科学实验活动。县农机修造一厂党支部委员梁清和梁伙荣，胸怀大志，团结科技人员，带领全厂工人开展农业新机械试制工作。在试制中，他们同心同德，边学边干，边试制，边完善，使得一台台新农机面世。经过10年的艰苦试验，先后制造脚踏打禾机、电动脱粒机、小四轮拖拉机等先进农业机械。其中电动脱粒机、小四轮拖拉机远销省内外，深受农户欢迎。工业科学实验的开展，有力推动工业生产的发展，收到良好经济效益。196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654万元，比1956年翻了一番。

二、可鉴的经验

四会县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建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创造许多可鉴的经验。主要有如下几点：

(1) 领导亲自抓整党整风，是搞好党建工作的关键。四会县委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党整风都亲自领导。在整党整风前，他们和公社党委、各线党总支领导成员与组织部、人事局人员调查研究，摸清各党支部的情况，并按

一、二、三类排队。对一类的支部党员进行总结提高工作，鼓励他们争先创优，再上一层楼；对二类支部党员加强教育，鞭策他们赶超先进，创建佳绩；对三类支部党员严加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对其存在问题，限期整改。这样整党整风做到心中有数，工作有序。在进行整党整风时，县委组织强有力的工作队，公社党委和各线党总支相应组织工作组，两级党委领导亲自带队（组），领导开展整党整风工作。在进行中，他们一面组织支部党员学习有关文件，统一认识，提高思想，进而针对支部和党员存在的问题，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改变不良的思想和作风；一面组织力量内查外调，弄清事实真相，对好的肯定表扬，对不良的教育提高，对犯严重错误的按“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政策处理；应劝退的劝退，应清除出党的清除出党。通过不断整党整风，纯洁了队伍，增强了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据1965年有关资料反映，全县好的支部由原来的31%上升到72%；后进支部由原来的22%下降到1.8%，全县先进党员由原来的33%上升到64%；后进党员由原来的18%下降至2.1%。

(2) 加强党员素质教育，是好搞党建工作的重要一环。这里指的素质教育是文化、政治、思想和工作作风的教育。四会县委针对党员八成以上是文盲和半文盲的状况，首先抓文化知识教育。期间，一方面把文盲、半文盲党员送上级部门办的文化学校和自办的文化补习班、夜校去学习；一方面组织有文化的党员结对帮教。学习期限有3个月、4个月、5个月或半年、1年不等。通过学习，逐步提高了党员的文化素质，使九成以上的党员都达到小学毕业程度以上的水平，为他们学习党的理论和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打下良好基础。其次，县委分期分批组织党员到县党校学习，学习党的理论、大政方针、党的基本知识等，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10年来，组织党员学习（包括公社和各线办班）的有12800多人次。由于开展素质教育，各党支部成员不论文化知识还是理论、政策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他们自觉维护党的利益，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下布大队党支部通过学文化、学“毛著”等活动，政治、思想、作风等素质明显提高，掀起了大搞工农业建设热潮。全体支部成员带领社员兴修水利，改造低产农田，开山造地种果，建厂

办场发展工企业，取得优异成绩，一举改变下布的落后面貌，成为肇庆地区和省的先进集体。

(3) 积极培养党员干部，充实各线领导力量是搞好党建工作的根本。建国初期的四会百业待兴，各行业不断发展，需要大批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来加强对党政机关和各行业的领导力量。这样，才能有效地领导组织工农群众开展“三大革命”斗争。四会县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建工作中，十分注意培养干部工作。他们贯彻“认真挑选，严格审查，放手培养，大胆提拔，节约使用”的方针，制订规划，民主挑选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优秀党员进行培训。做法一，各级党委成员实行“二带三包”培养，即以老带新、以师傅带徒弟；包考察、包教育、包效果。做法二，选送党团员到省、地、县党校、干部学校培养。学习期限根据实际而定。学习内容主要是“一专五教育”。即学习专业知识；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的思想政治作风和党纪法规教育、阶级斗争和形势教育、群众路线教育。通过培养教育，有效提高其理论、政策水

平和工作能力，1956年至1965年先后选送优秀党、团员1300多人进行培训。县委按需要从中提拔学业成绩好的为股级干部645人，提为科（局）级干部374人，提升处级干部23人，分布于县、公社级的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力量，更重要的是使四会党组织后继有人，继往开来，具有战略意义。

三、记取的教训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四会党组织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发展党员受到“左”的思想干扰

四会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中受到“左”的思想冲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发展党员的工作受其干扰。当时，从县委一些成员到党支部的一些领导，对文教卫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较多的部门存有偏见，认为这些部门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分、出身、政历、思想作风都较复杂，不宜多、快发展党员。即使是政历、出身清楚，思想、工作有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参党，都要对其内外三

代左审右查，方允许其申请；至于能否成为正式党员有待研究。要是出身剥削家庭或与海外有关系的知识分子要求申请入党就更加困难。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这些战线和部门发展党员很少。以文化线为例，至1965年止，建国已16年，整个文化线只有8个党员，没有成立党支部。而这8个党员中，有4个是外单位调去工作的。他们过组织生活时，外单位来的党员，回原单位参加支部活动，其余的到有关单位参加组织生活。由于文化线发展党员少而慢，党长时间没有很好占领这块阵地，因而四会的文化事业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这一教训是要记取的。

（2）对党员的工作作风教育不够

工作作风是党风中重要的一种。它的好坏是直接影响着党的革命事业成败的问题。诚然，四会党组织由于对党员特别是对党的领导成员的工作作风教育重视不够，抓得不力。因而，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强迫命令、违反党纪党规、弄虚作假、夸大事实之事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为了完成某项工作任务，忘记了党纪国法，随意打骂、体罚群众，如某公社党委成员在1960年前后打骂社员23人，并把他们

放去农场劳动长达20天之久。又某生产大队党支部领导以社员不出集体勤为由，克扣了12户社员口粮，以傲效尤等等。这些做法引起了社员群众强烈不满，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县委发现问题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并责成肇事者公开向受害人检讨错误，赔礼道歉。同时给予党纪处分，情节严重者给予行政处罚，以息事宁人，挽回党的声誉。

(3) 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带来不良影响

阶级斗争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党员的阶级斗争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教育，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造成不良影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四会各级党组织按县委的指示要求，坚定不移地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党员必须站在政治运动斗争前列，对人对事都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久而久之，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在广大党员中影响深刻，总认为看问题办事情严一些比宽一些好，“左”一些比“右”一些好，否则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而逐渐滋长蔓延了宁“左”勿“右”的思想。那时，一些地区和单位开展某项工作时，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找“活靶子”批斗

开路，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但对上述“活靶子”批斗，就是对“四清”地区的党员、干部也是如此。四会开展第一、二批“小四清”的5个公社，在做法上是先把党员、干部赶“下水”，然后逐一查批斗争，没有问题的准许“上水”，有问题的必须交代所犯错误，赔退经济全部，听候上级党委处理。据统计，这5个公社参加“小四清”的党员和干部（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共5151人，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指导下，被划为“四不清”和犯其他错误的竟有2458人之多，占参与运动党员干部总数47.7%。在运动结束总结时，查明证实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四不清”的党员、干部不到1%。“左”的做法，伤害了大批党员干部，原因就是狠抓阶级斗争为纲，执行宁“左”勿“右”做法的后果。

正确的开端 不幸的后果

—— 四会县整风反右斗争情况概述

黄建灵

一、四会的整风运动

1956年，我国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社会主义、手工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的改造任务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严重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在国内有少数地区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要求退社等人民内部矛盾的现象。这种倾向和问题的出现，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如不及时解决和处理好，势必严重阻碍和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的大

问题。

为了彻底解决和克服党内的“两个脱离”，发扬过去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好传统，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继续前进，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共中央于1957年4月27日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指示》中指出：“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四会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结合本县的实际，于4月30日向全县发出了《关于组织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县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认真组织干部、教师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迅速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于5月29日

至6月3日召开了有324人参加的全县宣传工作会议，由县委第一书记韩志洲同志传达贯彻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精神，以及作了联系我县出现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情况报告。同时把这次会议作为全县整风学习的开始，要求全县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至10月底，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全体干部、教师反复学习和研讨毛主席的讲话和整风有关文件的指示精神，提高大家对党的整风运动的重要性的认识，掌握好思想武器，为我县开展整风运动打下基础。

随后不久，四会县委又对全县的整风运动作了具体安排：一是城镇的整风运动共分三批进行，第一批为1958年1月，第二批为1958年2月，第三批为1958年3月，1958年6月前结束；二是全县中小学教员的整风分二批进行，第一批先在本县的四中、江谷中学、黄岗中学等5间中学进行至1958年的暑假前结束。第二批为全县的学校，从1958年的暑假开始至年底结束；三是县委机关干部和工商界的整风于1958年春节前后着手进行。接着，四会县各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根据县委的指示和部署，先后召开了支部会和各种座谈会，组织全体干部、教

师反复学习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以及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号召广大干部、教师积极行动起来，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开展大鸣大放，诚心诚意地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顿不良作风。通过学习整风，提高了广大干部、教师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改进了工作作风。他们卷起铺盖，深入到群众中间去，和群众“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调查研究，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在大鸣大放中，大家对整顿党的不良作风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如工商界提出了7384条意见，其中有关领导干部作风的意见就达679条。但其中确也有一部分是片面的、过激的或是错误的意见。同时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企图变天的敌人，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借着帮助党整风为名，乘机发起向党向人民和向社会主义猖狂的进攻。这样，一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的党内整风，从此转

上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较量的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

二、四会的反右斗争

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四会县的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借帮助党整风为名，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极其猖狂的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在大鸣大放中，散布一些恶毒攻击党、攻击人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性言论，有的甚至夸大其词，说共产党漆黑一团、统购统销搞糟了，大鸣大放是共产党“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阴谋。他们散布的这些言论根本就与党的整风精神背道而驰，完全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其目的是力图把整风运动引导到反党反社会主义方向上去。针对这种情况，四会县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让他们发表，暂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后，四会县委为使广大党员干部明辨是非，坚定立场，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

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阴谋，以巩固党的领导和坚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于7月15日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向全县发出关于组织干部开展批判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通知，要求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从现在起至8月15日用一个月时间，组织广大干部、教师反复学习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文章，运用讨论、座谈会等形式，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7月16日，县委宣传部又向全县印发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路线，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学习报告提纲，并摘录了全国各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供全县干部、职工分析、批判。

四会反右斗争展开后，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均采取大会报告、小组讨论、典型批判、集体提高等形式，组织广大干部、教师对在大鸣大放中“鸣”放出来的一些言论进行大胆的分析批判，例如：一是怀疑或反对合作化的优越性，说合作社是没有前途的，是一条死路。认为入了社有三忧四无一空（三忧：一忧粮、二忧油、三忧有病无钱医；四无：一无柴、二无米粉、三无谷、四无蕃薯什粮；一

空：米缸空）；有的认为统购统销搞糟了，说统购统销是一统钱、二统命，并说统购统销有三大不好（一是六亲不认，二是家庭吵闹，三是无心生产）；二是怀疑和反对党的领导，说“党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在教育界，有部分老师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党不能领导学校，企图叫共产党退出学校、取消党的领导；在公私合营企业内部也有一些人说自己是“杉木灵牌、有职无权”，不服从政府派去的公方代表领导，不愿接受工人监督，打击排挤公方代表等。8月中旬，四会县委又一次向全县发出了《关于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宣传》文件。指出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敌我矛盾的斗争。接着又对四会开展反右斗争作了全面的部署，同时成立县委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四会的反右派斗争运动首先在文教战线展开。12月，四会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全县的中学教职员集中到高要专区（肇庆）进行整风反右。1958年2月，四会县委又将全县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学校的干部、教师集中在县城，运用摆事实、讲道理、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等方式，组织广大干部、教师对右派分子采取严

肃的、说理说法的斗争和进行彻底的批驳。在大量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真理面前，右派分子已感词穷理屈，陷于孤立。紧接着，四会县委根据各单位干部、职工、教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发表的言论及其出身历史和现实表现等，按照党中央颁发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以左、中、右的界线进行排队划分。由于当时党中央在工作指导上发生了“左”的错误，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看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许多日常的甚至善意的批评认为右派进攻。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打击了善意向党提意见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转移了整风的中心，为后来继续犯极“左”思想错误留下祸根；反右斗争使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我们党发展合作的好朋友，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在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四会县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150人，其中：党政机关6人，财贸32人，工交3人，农林水5人，文化4人，卫生2人，学校80人，工商界17人，侨联会1人。与此同时，四会县委还对被划为右派分子人员作了

严肃处理：一是开除公职的有49人；二是撤职、监督劳动的11人；三是撤职降薪留用的有41人；四是降薪留用的有48人；另有1人未作处理。在1958年2月，在以反对地方主义为内容的机关整风运动中，还有3名干部被划为“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处分。

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后，四会县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从1959年开始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至1964年先后被“摘帽”的84人，1972年至1975年被“摘帽”45人，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四会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政策为全县的所有右派分子“摘帽”和平反，并为他们恢复了名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搞好现代化建设的保证

——四会县在“四清”运动中对待干部问题的启示

冼鸿雄

四会县虽然没有搞急风骤雨式的大“四清”，只是开展小“四清”运动，但运动的结果还是针对、打击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给农业生产带来了莫大的损失。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依靠他们的大多数，是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从档案材料和调查了解原“四清”工作人员的情况来看，四会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中，是执行了一条极“左”的干部路线的。

一、“四清”运动是打击干部的大多数

1963年8月，四会县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

于目前在农村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示》，县委成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办公室，派出工作队到黄田公社、清塘公社下布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先行点。在试点工作开始时，只是成立清账组，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简称小“四清”）。诚然，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对的。对干部实行正面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从1964年11月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草案）》（即“后十条”）“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严重地夸大了敌对阶级的力量。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认为敌人在拉拢腐蚀我们农村的基层干部，并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认为只有进行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甚至提出有些地方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才能纯洁革命队伍，有效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使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所以，“四清”工作队从进村到全面铺开，都是小心翼翼地住进最贫最苦的农民家里，依靠那些平日对干部意见大的农民，与他们一起去摸干部的“底”，以为基层干部的大多数都是坏，好象都是被敌人俘虏过去了似的。于是运动始终不是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而是打击干部的大多数，实行一切权力归工作队，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为了说明干部的大多数有“四不清”，不管你有否“四不清”，一律按上边下达的百分比来清理干部劳动所得的工分。1964年10月，全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一共有6769人，其中所谓有“四不清”的就有5840人，占公社三级干部总数的86.3%，在清理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的劳动工分时，一律按百分比来砍掉，说被砍下来的工分是他们“多占”的。于是，工作队就利用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在群众中大造舆论，说什么“干部蜕化变质，只顾个人享乐，不肯为人民服务”等等来激发群众对干部的愤恨。同时彻底剥夺了他们领导群众开展三大革命斗争的权力，白天只跟着群众去劳动，或者由工作队指定“难啃”的工种干；晚上不是被工作队抓去

写检讨或进行审判式的问话，就是被推到群众面前接受无情的批判斗争，强制他们吃无缘无故的苦果。一些因有海外关系，加上在平时工作时“得罪”了一些人的干部，被说成是混进革命队伍而被开除出去。那时，对待“四不清”干部，与在土地改革时对待地主分子一样。当时在“四清”工作队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如果你放过一个‘四不清’干部，就等于在土地改革时放过一个地主分子”。由于这样，所以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对“四不清”干部的斗争越来越变得“高档”了，一时被工作队集体训话；一时被隔离审讯；一时要你上台陪斗（斗争某干部要你上台陪斗），采取车轮战术，搞得基层干部无时无刻都要应付群众的批斗，思想包袱何等重呀。在经济退赔时，一些不清不白也被扣上“四不清”帽子的干部，家境又困难，确实无能力去退赔，就被扫地出门、封屋，使他们无家可归，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他们的家属同样受株连、被歧视、被孤立。

由于公社三级干部的大多数被说成是“四不清”干部，随时受批挨斗，人人自危，致使一大批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无心、也

不让他们去领导生产，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例如在黄田公社8个生产大队的领导班子中，“四不清”问题严重的占3个，一般的占3个，比较好的只占2个。该社的西岸大队有22个生产队，1964年早造稻谷减产的就有15个生产队，共减产稻谷41000多斤。

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任何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赖以统治这个党和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是党的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忠实拥护者、宣传者和执行者，是立志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忠实战士；是具有远见卓识和较强组织领导能力和较强的业务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各地区、各个行业及各个生产部门的决策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党在我们国家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石；是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他们不断地把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及时地送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同时又不断地把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各种合理要求反映到党里来，使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决策，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实践反复地证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要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要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的路线和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我们四会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上，每取得一个胜利，都是我们全县干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和艰苦奋斗的结果。如在根治大旺、迳口血吸虫的斗争和开展推广水稻良种科学种田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我们的干部在那里作中流砥柱，起战斗堡垒作用，不遗余力地去宣传推广“杂优”，带头开展科学管理生产，是根本不可能向世人宣布我县消灭了血吸虫病魔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打了个粮食翻身仗，不仅解决了自身的粮食需求，而且每年还向国家交售那样多粮食。然而，在四会的“四清”运动中，不但没有依靠那一批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而且还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一棒，一律靠边站。还说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在干部队伍中的反映，已严重地腐蚀干部，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

系，挫伤了群众搞好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发展。把农村基层说得一无是处，仿佛哪里有干部出现，那里的生产就搞不起来，经济就不能发展，群众就受遭殃似的。无情地剥夺了他们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权利，以为踢开了干部一切都好办了。可是适得其反，其严重的后果导致粮食减产，经济倒退，给党和人民带来了莫大的损失。

我们的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和比较好的。他们是经过长期的三大革命斗争考验的，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只有紧紧依靠他们，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落到实处，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诚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确有极少数素质较差，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一些年轻干部，由于对党和人民奋斗的历史经验了解不多，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政治上不够成熟，在思想作风和组织纪律方面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放松自我改造；有的干部不认真看书学习，不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强调局部利益，不注意大局，不注意政治，

甚至分不清基本原则的是非界限；有的干部作风漂浮，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有的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经不起考验，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堕落为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上述所有种种，都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在我们少数干部中的反映。只要通过学习，认真改造世界观，相信这些干部中除极个别之外，其余大部分是能够改过自新，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的公仆的，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的。

三、能否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试金石

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综合工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既要做持久的努力，又要有时代的紧迫感；既要有坚定的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必然是充满着奋斗和牺牲，交织着成功和失败。所以，我们要很好吸取因在“四清”运动中打击干部大多数

而带来生产、经济巨大损失的沉重教训，很好地总结过去我们在革命斗争中教育、培养、使用干部、调动他们积极性的丰富经验，坚定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四会现代化的建设，是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伟大的事业，它不仅需要大批高素质的而又富有探索精神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各种科学实验，更重要的是有大批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勇于献身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又有丰富斗争实践经验的干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既解放思想，又实事求是，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客观情况出发，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去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开辟新天地，发展新形势。

能否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和失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相信不相信、依靠不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是搞好现代化建设的试金石。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口头上讲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而更重要的是付诸行动，大胆相信他们能把事情办好。同时要教育他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为人民服务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不管哪种情况下，

都能牺牲个人利益，维护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通过各种形式培养他们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各种新的外部因素也在迅速增加，西方的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采取各种手段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使他们能识别和抵御各种错误思想，保持清正廉洁，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同时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他们四化建设的专业知识，耐心引导和帮助他们积累工作经验，逐步提高他们的领导艺术和才能。不断指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他们的理论知识，增加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逐步提高他们为人民服务和四化建设的素质；教育和培养干部的目的是使用干部。为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在教育和培养干部的同时，大胆地使用他们，把一些年轻有为的干部放到四化建设的风口浪尖去锻炼，大胆地把他们选进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让他们担任一

定的领导工作，实行以老带新，使他们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增长才干，真正经得起风吹浪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五十年代四会水利建设的回顾

樊灶淦

五十年代期间，我县（1993年撤县设市）和全国各地一样，在省、地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坚决贯彻我国“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力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水建方针，组织浩浩荡荡的水利大军，全面兴建整治了一大批水利设施，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促进四会工农业生产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初步取得很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加强党的领导，建立水建机构

1949年10月16日四会全境解放了。首先成立了“四会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着在上级党政部门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共四会县委员

会”和“四会县人民政府”。县委、县府客观地面对民国时期遗留下的那个经济烂摊子，尤其是对那30条隐患丛生、能否夺取农业大丰收，改善群众生活的“豆腐围”，心存担忧，真是心急如焚。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建设，夺取粮食大丰收，安定群众的生活情绪，县委、县府根据我国水利建设的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县人民开展群众性的修复堤围保丰收的工作。县委和县府的主要领导不但亲自上堵口复堤第一线指挥战斗，还从机关抽调得力的干部到基层去，充实水利的领导队伍。虽然从1950年到1959年间，广宁、四会两县又合又分县（以下均为四会的统计数字），但历届县委、县府领导都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工作，先后成立了“四会县防洪复堤委员会”、“农建科”、“水利科”、“四会县防洪指挥部”、“四会县水利局”和“广四县水利水电局”、“广四县防洪指挥部”等水利领导机构。

为了更有效地领导全县人民迅速完成堵口复堤任务，开展其他水利设施建设，县委、县府发文要求各大堤围、各区（镇）都要成立“水利会”。1950年春，我县仓丰围率先组建了“水利委员会”，很快掀起了一个如火如荼

的堵口复堤的群众热潮。在它的影响下，全县各条大堤围和14个区（镇）都先后成立了“水利会”。这样，全县的水建管理工作就落实到了各区（镇）堤围段，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管理网络，为今后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夺取农业大丰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堵口复堤，防洪治旱

1949年7月，四会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水灾。绥江沿岸堤围崩决，洪水毁坏农田、民房无数。灾民离乡背井，其景惨不忍睹。

刚刚成立的县委、县府领导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马上组织全县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走遍四会江河沿岸被毁的堤围，进行实地调查勘测。根据掌握的情况，从四会的实际出发，决定近期水建工作以防洪为主，重点抓堵口复堤、联围筑堤和部分治旱相结合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上级的支持下，立足自力更生，在全县范围内很快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水利建设热潮。大兴、隆伏联围、清莲、龙江等围段摆开了堵口复堤的战场。农民群情振奋，大部分中、壮年劳动力都投身到水利工地。为了集中更多的劳动力迅速完成堵口复堤任务，大沙区

人民政府动员没有复堤任务的上林区近400名农民支援隆伏工地。他们团结奋战，提前十天完成任务。县府及时在其他水利工地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一个热火朝天的堵口复堤兴修水利的群众性热潮迅速在全县范围内掀起。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2年，我县完成大兴、隆伏联围、清莲、龙江等围15宗，堤长109.6公里，大小引水工程78宗，引水量0.78秒立方米；塘库工程12宗，总库量达4.97万立方米。

上述所有工程建设都经得起后来的洪水考验。农民群众在自己的土地上无忧无虑地积极耕种，并连年获得粮食大丰收，水利工程建设发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国家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3年，我国国民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县水建工作步入由堵复防洪转向治涝治旱及引水灌溉相结合的新阶段。县委、县府积极领导农民群众开展治理涝旱“两魔”的斗争，并取得节节胜利。

四会是一个半平原半丘陵山区的地区。土地既易涝又易旱，严重地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县委、县府领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认真地总结过去领导人民治水取得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决心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降伏“两魔”，夺取农业大丰收。在治理“两魔”的战斗中，他们一方面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修订降伏“两魔”的工程规划；一方面继续积极发动群众，坚持长期治涝治旱。首先，对马岗、白鹤等原有17条较大的堤围进行堤系整治，合并为丰乐、隆伏、大兴、黄岗等9条受益万亩以上的大堤围；完成柑榄、石狗、黄岗、隆伏等19条堤围的岁修工程；对128段堤段，以历史最高水位以上三十厘米为标准加厚加高，加强堤围岁修及固堤养护工程，为防洪治涝打下了进一步基础。

为了更好地解决四会中部、北部和东北部等丘陵山区耕地的干旱问题，县委、县府领导在前段完成部分治旱水利工程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干部群众筑库建坝，先后建成小（一）型水库有：大坑口、鸡啼岭水库；小（二）型有：庙孔堀、谢家堀、前峰、莲子迳等大小工程163宗，库容达1068万立方米。此外，还环山修筑拦洪沟（坝），兴建了一大批如清塘白沙、大沙陶冶口等灌溉面积均达千亩以上的引水工程；兴建了如仓丰、大兴等83台（站）机

械排涝工程和一批涵窦、陂坝工程，为我县丘陵山区的耕地抗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上各种大小水利工程的建成，提高了我县丘陵山区耕地防洪抗旱的能力。1955年是我县百年一遇的水灾旱灾年，但当年的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计）却比1949年增加了17%。

三、大兴水利，综合利用

1958年，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脱离客观实际，一哄而起，动辄搞群众运动，给生产力带来了莫大的损失，然而，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县委、县府领导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发动群众堵复固堤、大筑山塘水库、提水引水、降伏涝旱“两魔”的基础上，继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综合利用，真正体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伟大作用，把治水与修筑中小型水库、防治血吸虫病、防止水土流失和小型水电站的建设结合起来。从1958年9月底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个以修筑江谷水库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除了受益区的农民群众积

极投身水利建设外，县委还组织非受益区以及社会各界的干部群众3万多人，参加水利大会战。全县每天出动约6万多水利大军，日夜奋战在各个水利土地上，劳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同时，还在工业和财金贸系统中抽调人力、财力、物力及时地为水利工地提供各种急需工具、物资和筹措资金，大大地加快了工程的建设步伐，保证了各个工程能按时按质或提前竣工。

在完成各个水利主体工程的基础上，县委、县府又努力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解决根治血吸虫疫区——大旺草塘的启动资金780万元，成立了治理、垦荒草塘指挥部，组织了社会各方力量，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大旺草塘。数千名民工在指挥部的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劈山、筑堤、挖渠、开坑排灌水、灭钉螺，出现了一个“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壮观劳动场面。到1959年止，仅经过两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就完成了土石方159万立方米；筑堤22.5公里；灭螺48.3%，根治大旺草塘，消灭血吸虫病的水利会战初见成效。

与此同时，县委、县府还狠抓了水土保持和河道的裁弯取直、清障、疏通淤塞及建设小

水电等水利建设工作。

在十年来的治水治旱工作中，全县约投入1100多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419万立方，新筑或加高加固堤围22宗，总长105.9公里；大小拦洪沟3条，总长13.73公里；小（一）、小（二）水库32宗，总库量为1052亿立方米；大小引水工程4宗，引水量为5.76秒立方米；防洪保护面积1.72万亩，比1949年增加了2.02倍。各项水利工程设施的完成，不但解决了涝区的防洪排灌问题，而且还解决了苦旱区耕地的灌溉问题，不但有效地改变了过去四会十涝九旱的生产条件，而且还扩大了耕地面积约8万亩，全县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6%，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四会五十年代的治水治旱斗争中，尤其使人不能忘怀的是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积极分子。如李炽洪、黎锦荣、张奇中、李金清、李英、邓文、陈世光等。其中李炽洪还被国家水利电力部授予“全国水利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他们都为改变四会的穷山恶水，建设美好的河山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业绩将永载四会的史册，更好地教育后人，奋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依靠政策 落实措施 共渡难关

—— 略述四会克服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经验和教训

樊灶淦

1959年至1961年，是我国发生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四会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坚决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县委、县府（1958年10月四会、广宁合并为广四县，至1961年4月两县重新分县，内文数字为四会统计数字）领导广大干部群众临难善谋，不断调整农村各项政策，纠正错误，战胜困难，艰难地渡过了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一）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缘由

1958年以后，我县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各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全国人民正满怀胜利希望，热火朝天地投身到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中去。从1959年始，我县乃至全国各地却陷入了三年经济严重困难之中。痛定思痛，追根寻源，造成这一厄运有如下一些缘由。

一、主观臆断，没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严重地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在取得第一个五年计划成绩面前，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中央一些领导人及党内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没有按持续有序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四会县委、县府在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推动下，急于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从而削弱、动摇了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农村三级所有制基础，以致引发了以“高指标”、“瞎指挥生产风”、“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给以后三年经济严重困难埋下了祸根。

二、1959年以后，我县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饥荒袭人，非正常的社会死亡人数日益增加，致使我县农业生产严重受创。

三、面对天灾、人祸和饥荒的胁迫，部分

社员群众向往城镇，弃农就商，或另谋生计，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流失，严重制约了我县大办农业所需劳动力的投入。

四、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致使我国经济建设蒙受重大损失。在全国上下天灾人祸频频夹击之下，我县乃至全国各地都陷入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厄运之中。

（二）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四会的状况

1958年基本实现公社化以后，我县各业取得一定的成就。但由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和实行政社合一体制的局限，在贯彻中央、省、地委有关方针政策的推动下，县委在执行上级指示时有偏差，导致在社队所有制过渡问题上，混淆了集体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由刚建立的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急于向基本社所有制过渡。1959年以后，全县各公社首先实行“四集体”（即生产、劳动、分配、食堂均集体）为过渡到基本社所有制迈开了第一步。为了发展、壮大公社经济，继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后，在全县范围内又一次刮起“高指标”、“高征购”、“放卫星”的浮夸风。为此，农村各地层层虚报粮食产量。如1959年晚造，有

的公社虚报亩产高达1000公斤。由于要完成“高指标”、“高征购”任务，社员本来并不丰裕的家底也被“征”光了，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1959年8月，县委还组织力量在农村错误地开展“反瞒产”运动（实际上是逼群众虚报粮食产量），为“浮夸风”推波助澜，社员群众生活日渐贫困。

同时，我县农村各地也采用“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办法急于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由于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它可以将生产队和社员的土地、耕牛、生猪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无偿地“平调”上交。尤其是县、社两级可以无偿地向生产队抽掉大批劳动力投入兴修水利及大办工业中去，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为了进一步加快抢先过渡的步伐，我县曾一度不恰当地限制和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农贸市场，使社员群众的家计之需得不到补充，直接影响了社员群众的日常生活。

在组织农业生产问题上，个别领导不作调查研究，不尊重群众的生产经验，胡乱瞎指挥生产。如我县山区某大队一向有种木薯的习惯，但公社领导却将其一半多劳动力调去搞其

他工作，使该大队木薯等杂粮作物没有照常种植，造成杂粮减产，社员群众食不裹腹，生活困难。

在分配问题上，从县委到各级党委对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理解不深，执行不力，存在平均主义倾向。由于农村实行大集体生产，造成社员出勤不出力，评工记分视各人的嘴皮功夫。“取酬”与“按劳”明显脱节。总之，“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违背按劳取酬、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原则，打击了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削弱和动摇了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发展，致使农业生产严重受创。

在“浮夸风”、“共产风”影响下，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也受到侵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个人主义思想严重，贪图享乐、贪污浪费、借支挪用集体公款、生活作风特殊化、对群众生计不闻不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动辄骂人、打人、克扣口粮、体罚群众，一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这三年，我县自然灾害频频发生。1959年以后，我县多次连降大暴雨，山洪暴发，毁坏农田水利设施，农作物和村舍受淹。仅1959

年，全县农田受灾面积达14000多公顷，人员也有伤亡，很多地方出现饥荒。为了生计，有的人出外逃荒打工，但更多的固守本土。由于饥荒所迫，他们就上山下地采“青”糊口，瓜菜代饭，或以蕉头野菜充饥，或以粗糠、“双蒸饭”裹腹，造成群众营养不良，体质严重下降，群体性水肿等病患者和不正常的社会死亡人数日益增加，尤以1960年上半年为甚，致使全县农业生产严重减产。据统计，这三年全县水稻种植面积和社员人均口粮水平比1958年分别减少2217亩和85斤。如何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排难救灾，走出困境，一道严峻的历史命题严肃地摆在我县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面前。

（三）依靠政策，克服困难，走出困境

在经济严重困难面前，县委决心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以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为指南，坚决执行省、地委指示，全面调整农村各项经济政策，采取果断措施，排难救灾，渡过了难关。

一、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纠正“共产风”

1960年下半年，党中央针对全国灾祸频发的严峻形势，运筹决策，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接连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称“十二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称“六十条”）等文件，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种种错误。

为了清除因受“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和解决我县部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恶劣等问题，按照上级部署，1960年8月，我县开展了以“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在运动中，县委以中央“十二条”和“三反”整风运动的有关方针政策为思想武器，主要解决党员干部普遍存在个人主义、官僚主义等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检查和思想整顿，全面清算了“共产风”的危害，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党风政纪教育，较好地解决了党员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其在重要历史转变时期经受了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了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在“三反”整风运动中，县委坚决贯彻关于“要彻底赔退”的政策，经过核查，据实落实赔退政策，使广大社员群众亲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更加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为了巩固“三反”整风运动的成果，1961年8、9月间，县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六十条”中关于调整生产大队规模，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从1961年起，至少7年不变”的政策，重新确定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确立“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把土地、耕牛、农具和劳动力固定到生产队，并明确规定：任何部门单位不得随便调用生产队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不许干涉、乱指挥农村基层的农业生产工作。社员劳动收益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计算劳动报酬。县委还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恢复发展生产的“十条政策”，全县重新扩大划分了社员自留地和饲料地，鼓励社员开荒、发展家庭副业，全部开放了农贸市场。县委通过依靠党的政策，制订一系列具体措施，发展生产力和调整生产关系，急刹“一平二调”、“共产风”，这对于稳定群众生活，

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发展以队为基础的农村三级所有制，无疑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二、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渡过困难关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是党在农村工作的一贯政策。大办农业要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才能奏效。为此，根据当时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状况，县委指示，坚决把以前通过各种渠道从农业线抽调出去的人员压缩回到农业线来，并且严格控制水利等农业基建的规模，加强农村劳动力管理，促使大批的劳动力重新回到农业第一线，为大办农业提供了足够的力量。在指导农业生产方面，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发动群众，因地制宜，拓耕扩种，多种经营，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全县粮食生产得到持续发展。1960年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杂粮总产量分别比1959年增长7.3%和5.1%。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这对于在重要历史转变时期治乱安民，稳定社会局势以及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加强社会各业对农业的支援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以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的方针政策，我县在经济严重的困难时期，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八方支援农业。1960年初，根据地委指示，动员我县工业、交通部门大力挖潜，开展技革活动，加快农业技术改造；财、金、贸和供销等部门携手合作，开辟税源，调拨物资，组织商品下乡，开拓畅通购销渠道，活跃农村市场，掀起支援农业“三化”高潮，有力地促进了我县大办农业群众运动的持续发展。

四、组织生产自救，全面安排群众生活

1960年以来，我县自然灾害饥荒频发，因营养不足引发水肿病等病人陆续出现，非正常死亡的社会人数急剧上升，灾情严重，形势危急！组织群众救灾纾难，共渡难关，亟待解决的问题已摆上县委领导的议事日程。他们深入社队，调查灾情，迅速制订一系列应急方案：

- 1、对灾情严重的社队，县委指示，公社党委书记挂帅，火速组织工作组，深入社队核查灾情，制订相应措施，分工包干，各负其责，限期解决问题。

- 2、洪水退后，县委迅速组织灾民，抢修毁

坏的水利设施，排涝扶苗洗苗，大抓高产田管理，引导社员开荒扩种秋番薯，生产自救渡难关。

3、大灾之年，县委贯彻落实“受灾免税”政策，在重灾区开展评灾减免税工作，据实减免灾民公粮款额，使灾民及时得到政府的扶持，增强了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信心。

4、对少数确实缺粮的公社，通过内部调剂解决，并号召群众广开“粮”路，大搞代食品生产；对缺钱发展生产的灾民和特困户，可由国家发放有关款项给予扶助支持。

5、1960年上半年，我县因营养不良导致水肿病等病情严重恶化蔓延。县委高度重视，并及时得到省、地委的指示和支持，与病情严重的各级社队党组织立下军令状，要求务必在当年5月初前限期把病人医治好。为此，县委对全县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药物统一调用。对病情严重社队则将病人集中到大队施治。组织医疗队下乡巡回医疗，并指导、提高各地卫生院（所）医疗业务水平。自3月到5月初，县委多次部署火速下拨大米、生油和 various 副食品等一大批营养物资和救济款，指示在限期内分批发放到病人手里。同时对一般社员生活、生产实

行口粮配额和劳逸结合制度。通过多种有效应急办法，终于在限期内控制、减缓和阻遏曾一度严重威胁、影响我县广大群众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群众性恶性疾病的蔓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县委和各级党委依靠党的政策，群策群力，履难谋策，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艰难之际及时得以休养生息，纾解困难，从而渡过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难关，在重要历史转变时期，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今后几年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打开了局面，作了比较顺利的过渡。

（四）有益的经验，深刻的教训

回顾我县经受并比较顺利地渡过这段艰难的历程，我们从中可以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 and 深刻的教训。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县委、县府面对艰难繁杂的局面，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紧跟党中央的部署，不断请示并得到省、地委的大力支持，坚

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贯穿在整个时期的每个工作环节之中。革命事业有了党这个核心力量，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党就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强大的战斗力，多么繁杂危难的局面也能驾驭，多么艰苦的困难也能克服。它有力地昭示我们，无论任何时期，干什么工作，无论局势和困难多么繁杂艰巨，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就能信心百倍，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二、依靠政策，落实措施，是渡过艰难困苦的关键。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力的体现。在这场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历史考验面前，我县各级党组织以中央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为指南，及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作的“十二条”和“六十条”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制订得力的措施，坚决纠正“左”、右倾路线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全党上下，步调一致，局面繁杂不迷乱，情势危难不怯退。县委、县府用党的政策运筹施政，使党的政策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前进路上的困难和阻力不少，新问题层出不穷，等待我们去研究，去制订新政策，去解决各种问

题和阻力，如果不执行或偏离党的政策，或是执行政策忽“左”忽右，或是忽略政策的研究，势必会影响或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才能排除各方面的干扰和阻力，解决新问题，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

3、干群同心同德，是战胜困难的有力保证。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依靠对象和主力军，干群同谋共策，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的有力保证。在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县委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首先抓党员干部思想建设这个根本。1960年下半年根据上级指示，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三反”整风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整顿，扫除了党员干部中各种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普遍进行了一次“立党为公”、“为民谋利”思想教育。为了更好地密切群众关系，他们来到农村、厂矿、企业等基层单位与广大群众“三结合”、“四共同”，大办高产试验样板田，指导农业高产丰产。他们带头省吃俭用，支援灾区。广大党员干部身体力行，与群众同甘共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从而增加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和支持。共产党人只有牢固树立为民谋利的思想，时刻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克己奉公，勤政为民，干群同心协力，扭成一股绳，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否则，如果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信赖支持，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四、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势必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长期克敌排难、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在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部分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生产、生活不闻不问，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滥用职权，贪污浪费挪用集体公款，思想作风恶劣，动辄骂人、打人、扣口粮、体罚群众。加上天灾病疫肆虐，群众生活苦不堪言，造成部分群众迁怒政府当局，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使这一时期党的各项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千古名训。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甘苦

冷暖惦挂心上。我们制订、实施的每一个改革方案，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承受能力，切不可损民犯众，背离民心，以免重蹈“文革”十年内乱错误，局势危乱的覆辙。当前，尤其是对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些社会民生敏感问题，各级领导在决策施政时务必要以“三个有利于”为出发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因势利导，顺乎民意。只要我们牢记党的宗旨，体恤民情，关爱民生，充分调动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上下形成合力，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五、脱离实际，主观臆断，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1958年我县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在贯彻中央、省、地委指示的推动下，县委个别领导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社队所有制过渡问题上犯了急躁冒进，抢先发展的“左”倾错误。一时间，公社经济发展过猛，“浮夸风”、“共产风”泛滥，极大地削弱、动摇了刚建立的以队为基础农村的三级所有制基础，严重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三年经济严重困难的恶化。它从反面告诫我们：凡事都应该尊重科学，按其自身发展规律办事，不可主观臆断，盲目超前发展，否则

“欲速则不达”，最终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在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决策施政务必遵循事物发展由易而难、循序渐进、持续有效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切莫头脑发热，不顾实际，急于求成，一哄而起，否则会把事情弄糟办坏。如一段时期内，全国上下一窝蜂地“全民经商”、“炒地皮”开发房地产等，这些“泡沫”经济的引发违背改革开放适度发展、持续有效增长的发展规律，以致给发展经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延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前车之鉴，犹为值得各级领导决策施政时记取的。

五十年代四会工人运动概述

赖悦祥

在解放初的10年里，四会县总工会在四会县委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成为一支政治觉悟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队伍。这支队伍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和建设工作，为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完成党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颇大的贡献。

一、建立工会机构，培训干部队伍

1949年10月16日，四会县全面解放后，在同年11月重新建立中共四会县委时，就分工县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叶永禄同志作四会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吕剑明、何绍、黎

日晶、李尚敬等同志。他们先后在四会镇的海员、理发、搬运、扎排、米业等行业工人之间进行调查摸底工作，物色和培养工人积极分子，陆续筹建了海员工会、搬运工会、理发工会，以及米业、药材、咸杂、茶居等行业工会。并在大沙、迳口、威整、江谷、黄岗等地筹建了基层工会。

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建立县总工会的各方面条件业已成熟，于1950年11月，在四会镇举行四会县第一次工人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70人。大会听取了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四会县总工会第一届委员会。有委员19人，其中有常委11人，由叶永禄同志任主任委员。

为了加强县总工会的领导，县委把先后派去中南工会干部学校和南方大学学习后结业回来的李卓和李尚敬同志安排到县总工会担任领导工作。李尚敬同志任总工会的组织部长。

四会县总工会成立后，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对旧工会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保证工会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根据自身的特点，开展各项活动。四会镇的扎运工会的前身是四会县放运联合工会，解放初期仍然被地主恶霸、

行业把头把持着领导权，他们还在暗中为非作歹，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新成立的扎运工会在县总工会的指导下，采取设卡登记、处理转业等办法，清洗和改造了一批原来放运联合会的不良分子，基本上纯洁了扎运工人的阶级队伍。

为了壮大工会的力量，提高工会的素质，工会吸收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253人为工会的新会员，并从各基层工会选调了工会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100多人，参加县总工会举办的工会干部培训班。认真组织他们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学习贯彻中南总工会颁发的有关开展工会工作的文件精神，和广东省首届工人代表会议的决议，有效地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

1952年5月，广宁、四会两县合并为广四县，四会县总工会也改名为广四县总工会。1953年6月，在四会镇召开了广四县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80人。这次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广四县总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并推荐陈沛、李尚敬等11人为常务委员，由陈沛担任广四县总工会主席。这次会议后，在全县范围内很快地掀起一个如火如荼的宣传

贯彻会议决议的群众热潮，一个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劳动竞赛的群众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此后还分别在1955年、1958年召开过两次工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曹冬祥为主席的第三届总工会委员会，和以李尚敬为主席的第四届总工会委员会。这两次会议前后都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和工会干部，不断充实工人阶级的干部队伍。他们都能朝气蓬勃地带领广大工人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二、恢复国民经济 巩固新生政权

为了有效地提高广大工人的文化素质，更好地让他们参加新生政权建设，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县总工会坚决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政务院关于职工业余教育的《暂行实施办法》，积极开办各种职工业余学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政治。学员人数逐年增加，最多的时候达到1260人，占工人总数的25.4%。这些工人经过职工业余学校的学习，政治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他们见到有些资本家对新生的革命政权不满，暗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的对新政权持怀疑态度，

或者消极经营，或者疏散资金，转移机器，甚至关门停业，造成众多工人失业。这些觉悟较高的工人便自动组织起来，在城镇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组成的工人纠察队，分成若干小分队，晚上轮流巡逻放哨，自觉维护城镇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严密监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准资本家人为制造众多工人失业；有效地制止了他们的各种破坏活动，维护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威，使新生政权能有效地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生产建设工作。

1951年，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后，四会县总工会的干部立即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和上级工会的号召，深入各基层工会，配合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下厂下店，动员和组织职工开展以“增产节约、提高工效、捐献飞机大炮”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县属各企业工厂和圩镇的基层工会成员同职工一起制订生产计划和爱国公约，认认真真地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四会县电力厂的全体职工结合自己单位的实际，提出了“三保两减”（即在生产操作过程中要保护公物，

保护机器，保证城镇电灯明亮，减少原材料消耗，减少工伤事故)的竞赛口号，有效地促进了该厂的电力生产。四会县碾米厂的职工制订了“四快四重”的爱国劳动公约，即在劳动过程中要做到磅谷快、开车快、筛米快、出米快；重客人、重互助、重批评、重公物。全厂工人积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表现得非常出色。那时全县有90%的职工参加了这种爱国主义劳动竞赛，有效地促进了全县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

许多基层工会还发动职工自愿捐献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并通过有关渠道把慰问品送到志愿军将士手中去，大大地鼓舞了他们杀敌立功的斗志。私营企业的职工，为了争取资方配合这次劳动竞赛，还主动接近团结资方人员、老板厂主，妥善提出合理化建议，鼓励他们改善经营管理，维护正常生产和营业，加速资金周转，减少费用开支。有的商店、工厂还订出每月营业基数或生产基数指标，将超额部分的50%提作捐献飞机大炮的资金，50%奖励超产的职工。这样既促进了生产经营的发展，加快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步伐，又能使劳动竞赛持久深入地进行下去。

在“三反”、“五反”运动前，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合理的正常的方式获得合法的利润，而千方百计地采用向国家干部行贿收买等非法手段来攫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在扎运行业中表现得特别严重。因此，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以后，县总工会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会同有关管理部门，派出8名干部进驻扎运工会，以扎运工会为重点，在工会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行贿、反偷税漏税的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三反”、“五反”斗争。发动和组织扎运工人，检举揭发扎运行业中的不法资本家和行业把头行贿收买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偷税漏税行为，维护国家的正常税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县共处理有偷税漏税行为的有226人。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全县商品价格下降了1%到5%，工厂企业的产品质量普遍提高了20%到30%，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县总工会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工人纠察队200多人，各圩镇的基层工会也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和民兵中队共87个，民兵小分队207个，共有民兵1088人，他

们配合党和政府利用连环画、黑板报、广播筒等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利用业余时间执勤站岗，夜间民兵小分队进行巡逻放哨，到处布下天罗地网，使敌人插翼难飞。镇反期间，他们还协助政府追捕各种坏人、敌对分子540人，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

土改开始以后，各地基层工会的干部和纠察队员主动宣传教育工人正确认识土改，支持土改。发动商店职工劝导各圩镇的商人、店主拥护土改，不做农村地主恶霸的“防空洞”，不替地主恶霸掩护和疏散财物等，为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使四会的广大贫苦农民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的大翻身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参加手工业改造 促进公私合营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四会县委县府紧跟上级部署，于

1953年11月召开了全县的手工业代表会议，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总路线精神。会后县总工会按照县委县府的要求立即组织各基层工会宣传贯彻县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的指示，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工人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至1954年下半年，全县城乡各地组建了第一批手工业合作社3个，即四会镇新新木器社、四会镇高观铁器农具社、汇源铁器农具社；手工业合作小组10个，即四会镇新建设木器组、红星竹器组、“五一”缝纫组、大沙木器组、大沙竹器组、威整铁器农具组、江谷铁器农具组和江谷车缝组等。在这批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推动下，四会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至1956年上半年全县已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达61个，占全县手工业的90%以上，基本完成了全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在公私合营期间，县总工会还通过工会系统积极发动和教育工人、店员和职工，要协助政府搞好公私合营，做公私合营的促进派。各

基层工会的领导经常采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启发教育提高职工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划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正确认识和执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好资方和他们家属、亲友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教育他们认识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必须彻底抛弃资本主义东西，坚定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自觉接受改造。由于各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打消了工商业者的各种思想顾虑，许多工商业者都自觉申请，甚至全行业集体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加快了公私合营的前进步伐。至1956年初全县参加公私合营的行业有23个，共220户，组织起合作商店594家，合作小组410个，胜利完成了全县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促进了工商业生产经营的发展。1956年全县的市场商品批发量和零售量大幅度上升，批发总额比1952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前一年）增加了一倍多，零售额总数比1952年增加了20%。

四、开展劳动竞赛 进行技术革新

工人阶级不仅是三大改造的促进派，而且是劳动生产的主力军。在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人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各个政治运动，参加各项社会变革，从事各种生产劳动。四会县总工会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东省总工会有关通知精神，从1951年开始便不断地发动和组织广大职工参加各种劳动竞赛。如1951年开展的以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1952年秋开始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的“双增双节”劳动竞赛，以及1953年以后连续几年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在1953年开展的“以技术革新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过程中，不少工人为了提前完成“一·五”计划的各项生产任务而加班加点，不少工人提出许多改革创新合理化建议，改进了生产技术，改良了生产工具，从而推动了生产发展，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工厂企业的经济效益。1956年全县的工业总产值达1334万元，比1955年的工业总产值1123万元提高了18.79%。随着生产的发展，广大职工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1956年地方国营工业企业的职工平均工资483

元，比1955年的平均工资391元提高了23.5%，公私合营的企业职工1956年的平均工资比1955年增长了9.7%。这样，便进一步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更自觉地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动脑筋、钻技术，进行技术革新和工具改革，因而涌现出不少先进生产者。

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期间，四会县新新木器社一等先进生产者罗金和铁工厂的一等先进生产者梁钊两个工人师傅联合起来，利用积压多年质量和规格不够理想的零件，经精心设计、改进加工，制造出一部电力自动打禾机，每天可以脱谷5万余斤，受到参加现场试验的许多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好评。四会农机一厂的技术工人也于1958年秋，在该厂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和技术创新，他们充分利用本厂的技术设备和发扬大协作的精神，设计制造了一台大型的立式车床。这种车床身高6尺，能够对工件的内外进行镗削和车刨加工，是一台多功能、高效率、低成本的新式车床。说它低成本主要因为当时制造这台立式车床只花了5000元，比那时购置一台同类车床需要15000元，造价成本降低了两倍，而它的

工作效率却比普通的卧式车床高一倍。“一·五”计划期间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我县工业生产的不断向前发展。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四会工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只有更好地加强党对工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步伐，早日实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青年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五十年代四会青年团的建立与作用

潘长荣

四会青年团自建立以来，围绕党在五十年代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各项活动并搞得有声有色，展现了新中国青年崭新的精神风貌。实践有力地证明：青年团是党不可缺少的一支后备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生力量。

一、四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

1949年10月16日，四会解放了。同年11月初，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四会县委员会”，同月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会县工作委员会”（当时属县委工作机构），并配备了专职工作人员，招曙任团县工委书记。1952年5月至1954年6月，四会、广宁合县期间，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四县工作

委员会”。1954年7月广四分县，同年12月改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会县委员会”。1955年2月9日—12日召开第一次团代会，出席代表301人，选举第一届团四会县委委员；张庆君当选为团四会县委书记。1956年3月26日—31日召开第二次团代会，出席代表255人，列席代表7人。主要内容是总结工作、表彰先进、讨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任务；选举第二届团四会县委委员及出席省第二次团代会代表，周新任当选为团四会县委书记；周新任、韩利威、张海明被选为出席省团代会代表。1957年5月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会县委员会”。1958年10月至1961年4月，四会、广宁再次合县，这时的团组织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四县委员会”。1960年1月19日—21日召开第三次（广四县第一次）团代会，出席代表578人；主要内容是传达团地委会议精神、审查团广四县委工作报告、选举第三届（广四县第一届）团广四县委委员及出席省第三次团代会代表；周新任连任团县委书记；袁恩耀、邱锦桥、廖明、陈苟、谢肖基、严秀芳、邓森荣、谭祯祥被选为出席省团代会代表。1961年5月再次分县，当时的团组织则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会县委

员会”。不管是合县还是分县，团县委在县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青年人的特点，为完成党在这个时期的各项中心工作而不懈地努力奋斗，不断地为党和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发挥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

团的主要社会职能为三个方面，其中居第一位的、起核心作用的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由团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团章规定：团是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这是党建立团的目的所在，也是团最重要的存在价值；党的“十二大”把助手和后备军联在一起作为团的性质载入了党章，表明党的事业需要青年一代来继承，党对团发挥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50年代，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四会青年团组织在党委和上级团委的领导下，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发挥青年的突击带头作用，动员团员和广大青年，以高度的社会主义热情投入了工

农业生产和扫盲工作，成为各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成为党的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和执行者。许多青年团员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中经受了锻炼，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组织，单是1956年就有684名优秀团员入党，真正起到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作用。

1、他们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面先进旗帜

土地改革结束后，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主持制订广东“一·五”计划，确定了广东省在“一·五”计划期间，是以发展农业为重点。四会县委、县府根据省“一·五”计划，结合我县的实际，也制订了是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规划。为了加快农业发展步伐，提前完成我县“一·五”规划，青年团四会县委就积极动员、组织团员和广大青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造大自然、发展农业生产的战斗行列。如组织有固定形式的青年生产队和起先锋突击作用的青年突击队。当时参加青年生产队和青年突击队的青年占全县青年总数的41.8%，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7年还成立县青年突击队总队部，总队长由熊子

清（原地豆区第二书记）担任，副队长由团县委书记周新任担任，在各大乡成立青年突击队大队部。为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完成，各青年生产队、青年突击队克服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顽强的斗志，向大自然开战，并取得显著的成绩。单是上林乡1956年就改造了1400亩“望天田”；在1956年下半年的备耕生产运动中，30000多个青年共积肥940292000斤；开垦荒地（至1956年2月止）14711.50亩；为农业社增产粮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50年代的水利建设中，新建大小堤围14宗，堤长共102.75公里，增加捍卫面积6724.30公顷；机械排涝站6座，排涝面积1293.30公顷；蓄水工程7宗，总库容1143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113.20公顷；引水工程4宗，引水流量 $3.16M^3$ /秒，灌溉面积1412.20公顷。在这些工程的建设中，热血青年一马当先，带头苦干猛干，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青年生产队、突击队成为农业生产的一面先进的旗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1952年比1949年增产11000吨，1957年比1952年增产4745吨。在组织青年护牛过冬、青年爱社的活

动中，都受到高要地委的通报表扬。1957年全县开展“评模”活动，青年生产队、青年突击队被评为模范队的有21个，占全县模范队的三分之一强，成为全县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面先进的旗帜。

2、广大青年是工业生产上的一支尖兵

五十年代四会的工业建设重点是发展食品、鞋革、家具、纺织、服装等轻工业。由于新建和扩建了许多工矿企业，加上原有企业的改造，到1957年，全县有工业企业112家。工业企业主要的有发电厂、砖瓦厂、食品厂、印刷厂、碾米厂、机械厂、火柴厂等。工业总产值有很大增长，1949年仅为1037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下同），到1952年增加到1439万元，1957年达到1864万元，比1949年增长79.7%，平均每年递增5.3%。

到1958年12月止，全县职工总人数为2322人，其中青年人数为417人，在青年中团员占291人。工业战线上的青年团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四会青年团根据需要，运用了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在全县组织了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开展节约、提合理化建议及推广新技术等

活动，为推动全县工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党的增产节约的伟大号召下，青年节约队队员，为国家节约了大批财富。如印刷厂团支部，拾回废纸、胶碎，经过加工后出卖，使厂增加了600多元的收入。

青年工人们以主人翁的态度搞好工厂工作，积极提合理化建议，1956年一年中就提了75条（其中30条被采纳）。如电厂青年监督岗针对安全生产，运用“警号”、“闪电报”、“教训”、“批评”、“建议”、“表扬”等形式，进行了60多项活动，帮助该厂消除事故，保证安全运转，使发电量超额完成计划112.90%。

青年工人们还打破保守思想，带头推广新技术。如人民电力厂在技术革新中，由于该厂团支部积极主动协助技工，采用“炭粉试制炭球”的技术，每月为国家节约90元；又采用“磨茜碎火”技术，提高利用率三倍多。又如电厂团员马礼仿制避雷器成功，使成本由50元降至为5元。人民印刷厂的青年也带头采用油耗定额，避免了机油和墨油的浪费，同时又用木薯粉代替了米粉的缝贴，降低了成本。

正因如此，全县63名青年职工在1957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3、扫盲工作的有力助手

扫盲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任务，是党交给团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扫除文盲工作需要我们青年把它担负起来”，“青年团员是党在扫盲工作中的有力助手”。

50年代，单是1957年全县文盲半文盲对象就达102400人，严重地影响我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迅速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从1954年以来，团四会县委组织团员和团结广大青年协助政府开展扫除文盲、半文盲的工作。全县组织各乡团支部、群众教师、各中小学教师利用寒暑假时间参加扫盲工作，使之全县形成一支一万多人的强有力的扫盲队伍，很快地掀起扫盲工作高潮。据不完全统计，组织的扫盲队伍1955年为14000人，1956年为27570人，1959年为15000人；文盲的入学情况：1954年冬为9006人，1955年26500人，1956年52000人，1957年25030人；扫盲毕业情况是：从1954年到1957年扫盲毕业的达110000人。

为更好全面总结扫盲成绩，交流先进经验，奖励和表扬扫盲积极分子，尽快完成扫盲工作任务，团县委于1956年1月27日至1月31日举行了第一届青年扫盲积极分子大会。会后，进一步健全了领导机构，制订了尽快完成扫盲任务的规划，采取了分队包组包村、小队包社包班、队员包个人和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采用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放学的方式；除班级教学外，还采用小先生制、联家学习、小组学习、包教包学、个别辅导等形式。由于方法对头，教学得当，1956年全县脱盲总人数达21840人，占当年扫盲入学人数的42%。

为了进一步巩固扫盲工作成果，团县委大力协助各地建起各种业余学习、民校、夜校511间，入学人数达14万人次。许多青年在校勤学苦练，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当上了记分员、宣传员、读报员，有些还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在扫盲工作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受团中央奖励的青年扫盲积极分子梁庆雄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50年代四会

的广大青年，在团县委的带领下，勇敢地站在各种运动的最前列，以实际行动锤炼青春、磨炼意志，充分显示出他们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是推动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前进的先锋突击力量。

革命和生产的“半边天”

五十年代四会妇女工作综述

——赖悦祥

四会劳动妇女过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和全国的劳动妇女一样，长期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和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束缚奴役，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最没有地位的一群。建国后，她们得到翻身和解放。四会历届县委县府以及各级妇联都十分重视提高四会妇女的社会地位，并且把她们发动和组织起来，让她们在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等重大社会变革以及在各项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一、加强学习，充分认识妇女在新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解放初期，四会妇女虽然得到了翻身和解放，但由于还没有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没有得到真正独立和解放，特别是数千年来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人们对妇女的许多旧的观念还没有改变过来。为了提高人们对妇女的社会地位的认识，县委县府和各级妇联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各个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时候，都十分重视教育广大干部提高对妇女在新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和社会上仍然存在的轻视忽视妇女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她们的重要作用。

1951年4月，农村普通开展“八字”运动，实行退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时候，县委根据“男女一齐发动”的精神，广泛地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八字”运动。这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议论也多起来了，说什么“叫女人参加退租退押、清匪反霸有鬼用咩！”、“女人一脚牛屎一脚泥，生定是耕田的，参加乜政治运动呀？”……有的男人不让妻子、女儿出去开会，怕伤风败俗。当时县委和县府以及县妇工委针对这些轻视妇女的各种议论和现象，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用毛主席在战争年代提出的关于

“中国革命离开妇女是不可能成功的”教导来教育干部群众，并指出，土地改革是广大劳动农民与数千年来的不合理的土地剥削制度之间进行的一场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同时，县委还决定：各区召开农代会选举农民代表时，必须坚持最少以二比一的比例，即每个行政村选三个农民代表最少应有一个是妇女代表；要求每个土改队员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要努力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同各种轻视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1953年10月县妇联主任陈银祥在广四县第一届妇代会上谈到妇女要积极参加普选时也曾指出：现在是我们当家作主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妇女，过去不仅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没有做主的权利；今天我们妇女和男人一样，有权选举为我们办事的领导人，几千年来还是第一次；因此，我们要珍惜这种权利，积极参加普选和各种社会活动以及各项民主改革。

四会县委和县妇联不仅通过加强学习来提高干部的认识，而且还在工作实践中，坚决带

头贯彻落实“全党都要做好妇女工作”的指示，把妇女工作计划纳入县委的工作计划中，做到统一安排、统一布置、统一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了成绩及时总结推广。在县委县府的带动下，全县各级党政领导也非常重视妇女工作，都把妇女工作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1957年2月28日高要专区妇联就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批转四会县妇联关于县委对妇女工作领导问题的报告。高要专区妇联在批示中指出：四会县委重视开展全县妇女工作，并加强对妇女工作的具体领导，抓住主要环节……使全县妇女工作都能够全面地推动起来，对完成党委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建立和健全各级妇女工作机构

1949年10月16日四会解放后，建立了以陈锋为主任、陈德为副主任的四会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于同年10月建立了以谭青同志为主任的四会县妇女工作委员会（下称妇工委），11月重新成立中共四会县委会。自此，县妇工委在四会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发动和组织城乡妇女参加党的各项中心工作。接着又先后在四区一镇（四会镇）建立区镇妇女工作委员会。1950

年6月22日至7月3日四会县妇工委主任谭青和梁萍同志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第一届农民、妇女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县妇工委率先在四会镇建立了“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学习委员会”，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城乡妇女学习省代表会议精神，发动和组织城乡广大妇女参加当时的扩军支前、征粮征税、防洪抗灾、生产渡荒、抗美援朝、退租退押、清匪反霸等各项中心工作。

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1952年5月，广宁、四会两县合并为广四县，县妇工委亦改为广四县妇女工作委员会，由严机同志任广四县妇工委主任。除充实和加强县妇工委的工作机构和各区妇工委的思想建设以及组织建设外，还先后在全县81个乡（小乡）建立了乡妇代会，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广大妇女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占全县劳动力60%的劳动妇女在完成土改复查和各种生产任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53年10月，在四会镇举行了广四县第一届妇女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223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民主选举产生了19名委员，并组成了陈银祥为主任，郭辉、张桃为副主任的广

四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根据省委省府指示，1954年7月1日广四县分县，恢复四会广宁两县建制。四会县随即建立“四会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使用“四会县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印章。为了健全各乡、社妇女组织机构，提高妇女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1955年县妇联对全县各乡、社的妇代会进行了一次组织整顿工作。在整顿中，淘汰了一批长期不起作用的乡、社妇代会的妇委，补选了一批在各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和加强了乡、社妇代会的组织力量，使他们真正地成为一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员会（56）第43号通知》“关于撤销区并大乡和调整县、区、乡编制工作”的决定，1956年3月，县委县府将全县原29个小乡合并为25个大乡，撤销了解放后组建的全县四个区的编制。接着，县妇联按照县委关于迅速将各大乡妇代会建立起来的要求，组织有关干部下乡，与大乡干部一起物色培养大乡的妇女干部，建立大乡妇代会，于1956年9月，按计划在全县25个大乡全面建立和健全妇代会的组织机构。为了迅速提高大乡妇代会主任的领导水平，县妇联于1956年12月组织全县

25个大乡的妇代会主任，参加高要专区妇联分会承办的广宁、四会县大乡的妇代会主任培训班。经过一段时间培训以后，大大地提高了她们的思想、业务水平和领导能力；并在她们当中选调一些热爱妇女工作、熟悉业务的妇女干部到县妇联工作，有力地加强了县妇联领导班子的组织建设。同时县委县府还在25个大乡配备脱产的女副乡长，县委分工一名常委主管全县的妇女工作。从上至下都加强了妇女工作的领导，使妇女在各种社会变革和党的中心工作以及劳动生产中，真正发挥“半边天”作用。

三、四会妇女在革命和生产斗争中的作用

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雄辩地证明：革命斗争如果没有广大妇女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以后还将是这样。从四会妇女在50年代的各种社会变革和完成党的各项中心工作所发挥出来的重要作用，也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一〉妇女是各种社会变革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四会县的劳动妇女占全县总劳动力的60%

以上。解放后，县委县府和各级妇联组织在完成各种社会变革和党的各项中心任务过程中，十分重视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1951年初举国上下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各大中小城市都开展“反美侵略运动月”的和平签名和组织示威游行等活动。四会县委县府和县妇工委按照上级指示，也组织过一次40000人上街的示威游行。四会镇和周边农村的许多城乡妇女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她们还积极认购国家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同年6月，四会镇的许多妇女、工商业家属和女店主都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筹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活动，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出一份力量。

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半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四会广大劳动妇女，特别是贫雇农出身的劳动妇女表现得特别坚决和勇敢。在诉苦会上，她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如一区的许奕娣这位贫农妇女在斗争地主罗大德的大会上，她勇敢地、面对面地把罗大德解放前强奸她和解放后不准她和土改积极分子来往，还多次恐吓她：

“你敢继续和他们串通起来对付我，国民党回来就先杀掉你”等罪恶行径揭发出来，公诸于众，激起全场群众的义愤，纷纷起来斗争罗大德，把罗大德斗得低头认罪。在斗地主、分田地的日子里，许多青年妇女自觉组织起来，白天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民工队修堤围，晚上参加纠察队集体巡逻值班、监视不法地主的阴谋活动；揭发一些不法地主分田以后仍然在暗中记变天帐、跟踪追查被没收的枪枝弹药的去向和土地分到哪些人手里的罪恶，为维护农村的社会治安，保卫农民斗争的胜利果实起了重要作用。

〈二〉妇女是农村生产战线的主力军

四会农村的劳动妇女是农村劳动生产的主力军，她们能吃大苦耐大劳。不论是防洪抢险，还是双夏大忙，她们都能排除万难，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1956年春耕开始时，县委为了夺取合作化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在全县推行农具革新和耕作技术改革。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培训了1000多名各方面的技术员，其中800名是女技术员。在技术员的带动下，合理的小株密植、单株密植、黄泥水选种、合成秧田、

疏播育壮秧等耕作技术，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如丰乐乡群雄农业合作社主任傅滚连同志，为了战胜那年遇到的历史上罕见的春旱，带领全社420多名妇女都学会用水车车水办田，用黄泥水选种，改铲秧为拔秧，推行合理的小株密植等农业生产的新技术，将全社1221亩水田适时插上秧苗，加强田间管理，夺取了早造大丰收，比上年同期增产40%。傅滚连同志的模范行动，得到县委县府的表彰，并被选为出席广东省第二届妇代会的代表，在省妇代会上她又被选为省妇代会的执行委员。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县在大搞兴修水利、积肥备耕高潮中，四会的劳动妇女的出勤率几乎高达100%，许多产妇、孕妇，年老体弱的妇女都主动要求出勤，开展社与社、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劳动竞赛。大沙公社妇联提出“汽灯底下当白天，寒风雪雨当晴天，两天工作当一天”的竞赛口号，向全县妇女挑战，很快就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个如火如荼的兴修水利、积肥备耕热潮。

1959年县妇联又在全县开展以高功效为内容的女能手运动，全县妇女热烈响应。在评选各种能手活动中，评选出各种能手23520人，其

中女能手8360人，占能手总数的35.5%。女能手运动推动着革命和生产两个车轮滚滚向前。

<三> 妇女是各项社会事务管理的“半边天”

解放初期，四会的妇女干部特别少，很不适应斗争实际的需要。县委县府和县妇工委以及下乡工队因此特别重视在各种运动中加强对妇女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据土改复查后的资料统计，全县农民协会的女主席有14人、女乡长31人、女农民协会委员548人。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结束后，据当时全县333个农业合作社统计：有女社长（又称社主任）181人、社务委员918人。1959年（广四两县再次合并后）建国10周年到来的时候，广四县妇联写了一份宣传资料，题目是《十年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里面有几个统计数字也值得参考，计有公社女社长8人；女大队长358人，占广四县大队长人数的25%；女包产队长1674人，占包产队长总数的31.9%。

县委县府和县妇联也很重视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让她们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在历届的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县党代表大会中，女

代表都有一定的比例。如1954年四会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总数439人，其中有妇女代表88人，占代表总数的20%；1958年召开的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数为153人，其中女代表有38人，占代表总数的24%。妇女代表所占的比例呈上升之势，说明县委县府越来越重视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

此外通过各级各类学校培养、培训的各类妇女干部也有一大批。在工业系统中有女干部310人，占系统职工总数的13.4%；有女医务工作者178人，占县医务工作者总数的16.2%；在党和政府以及群众文化社团、学校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妇女干部和妇女领导，积极参与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并且发挥她们“半边天”的重要作用。

50年代，四会妇女在县委和各级妇联的领导和鼓励下，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变革和党的中心工作，并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取得了显著成绩，也积累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县委重视和检查督促是做好妇女工作的重要保证。五十年代虽然四会换了几届县

委，又经过两次合县、分县，但历届县委都能分工一名常委分管妇女工作。1956年，县委还把几名原区妇工委干部选拔到县妇联工作，充实和加强县妇联班子的建设，使她们更好地带领全城乡妇女，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党的每一项中心工作。

1956年由于早造天旱，晚造又遇洪涝，一些地方粮食减产，农业减收，致使有部分人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甚至刮起一股退社风，特别是有一部分妇女社员带头闹着退了社，使相当一部人思想混乱。当时县委书记韩志洲在一次县委会上号召，要加强部门的配合，迅速击退那股退社歪风，特别要加强农业社中女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各部门互相配合，特别是县妇联突出地抓了一段时间女社员的思想工作，使部分闹退社的妇女思想稳定下来，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发展。

第二、建设一支素质较高的妇女工作干部队伍，是做好妇女工作的关键。广泛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和社会变革，这是各级妇联和妇女组织的主要责任。没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各级妇女工作干部队伍是无法完成这些重要任务的。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

妇女干部队伍，就要在斗争中发现她们、考察她们、使用她们、大胆地提拔她们。只有这样，才能使她们逐步形成一支无坚不摧的坚强的妇女干部队伍。五十年代的县妇工委主任谭青、黄梅、严机，县民主妇联主任陈银祥、张桃、郭辉，县妇联主任周凤娣等同志正是在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全县妇女工作的精英。她们真正是哪里有困难，就带领妇女们冲向哪里，是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素质较高的县妇女领导干部。那时各乡党委也善于把在斗争实践中，热爱妇女工作，熟悉业务，能独当一面的优秀的妇女选进到乡妇代会来，使之上下一致，朝气蓬勃地带领全县妇女，为完成五十年代的各种社会变革和党的各项中心任务而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旗鼓在前 百战不殆

—— 回顾四会五十年代的宣传工作看其今天的重要性

冼鸿雄

解放初期乃至整个50年代，中共四会县委宣传部就深刻地意识到：宣传思想工作是担负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环境的历史使命的。于是，就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千方百计地占领各个阵地，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及手段，大张旗鼓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当时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从而紧跟共产党闹革命，克服在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阻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胜利地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50年代，中共四会县委宣传部是怎样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呢？

一、建立宣传机构 加强党的领导

我党自建党以来都非常重视和狠抓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使党的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50年代，四会虽然经过了两次合县和分县，然而不管分合县，县委都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都分工一名县委副书记或县委委员任宣传部长，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早在1949年的11月，重新建立中共四会县委会时，当时机构仅设二部一室，其中一部就是县委宣传部，并由县委副书记领导宣传部，开展宣传思想工作。1950年3月，由县委委员叶永禄兼任中共四会县委宣传部长。隶属县委的四个区，其中一区建立了区党委（其余三个区叫作区工作委员会），就配备专职的宣传委员。1952年初，全县先后建立区党支部33个，每个党支部都有一名抓乡镇宣传思想工作的党支部委员。1952年5月至1954年的6月底，原四会县和广宁县合县，称中共广四县委，由梁汉夫任宣传部长。1954年初，由梁树桐等正副部长各1人，宣传干事3人（其中共产党员2人，候补党员1人）组成广四县委宣传部。全县13个区党委都配有宣传委员和宣传干事，并通过他们发动和组织

农民通讯员382个、读报组581个。如当时的柑榄乡就组织了一个有25人的文艺宣传队、一个农民通讯组、12个读报组，组成城乡的宣传网络。1954年的7月广四分县，中共四会县委宣传部由县委常委谢桐升任部长，并于同年的8月11日召开全县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宣传组织，讨论和制订全县的宣传思想工作计划。会后全县宣传员发展到3855人，报告员136名，宣传队伍越来越壮大。1958年7月县委号召要组织万人宣传大军，形成“生产大跃进，宣传打先锋”、“全党做宣传，全民做宣传”、“哪里有战斗、哪里有宣传、哪里有生产、哪里有鼓动”、“人人搞宣传、个个受教育”的群众运动。至此，全县有宣传员10451人，平均每5户就有一个宣传员；建立494个宣传队，宣传组1380个，读报组1689个，报告员150人，俱乐部208个，党校30间。实现了乡乡有宣传报告员，社社有宣传队、俱乐部，队队有宣传组，做到宣传思想工作千军万马，一呼百应。真正起到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环境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运用多种形式 宣传教育群众

宣传思想工作形式多样化，是使群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他们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性的根本保证。

解放初期，要彻底消灭和肃清残敌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完成土地改革任务，贯彻执行总路线，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高举“三面”红旗等中心任务。应如何保证党在这个时期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始终不渝地得到贯彻落实，较好地完成任务的呢？俗语说，旗鼓在前，就是运用各种宣传形式，用党的政策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使党的每一项号召，都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在这个时期，县委宣传部在县委的领导下，采取果断的行动、得力的措施，坚决地占领各个宣传阵地，运用①报刊、②黑板报和大字报、③算细帐、④实物展览和图片展览、⑤宣传早晚呼队、⑥宣传游行、⑦标语口号、⑧学生早晚呼队、⑨文艺演出、⑩回忆对比等10种宣传形式，深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群众受到深刻的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自觉行动起来与违反党的政策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从而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如土地改革

后，农民分得了土地，就埋头搞生产，不问政治，看不见光明的前途，部分农民和个别乡村干部对国家的粮食统购思想抵触严重，打算囤积粮食放债做生意，进行中间剥削或把粮食卖给私商，不卖给国家。有的乡干部说：“共产党‘花样’多，搞了复查搞扩军，搞了扩军又搞粮食统购统销。”四区浪口乡妇女主任李二娇说：“把粮卖光了，叫群众饿死，怪不得你们（指政府）叫我们种小麦”。一时给国家粮食统购统销带来了很大的阻力。针对这一情况，县委宣传部就运用上述的宣传形式，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伟大意义，使广大农民群众认识到把粮食卖给国家，是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是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共产党员曾伙妹明白了翻身要靠共产党，今后要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就要把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化建设。通过宣传发动，解决了各种思想阻力，在全县广大农村中，很快地掀起了一个卖余粮给国家的群众热潮，胜利地完成了国家给我县下达的粮食统购统销任务。

三、党政策入人心 推动中心工作

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主要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党在各个时期的政策能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推动中心工作不断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同志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何使党在各个时期制订的方针政策能得到坚决的贯彻落实，是关系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问题。因此，宣传部门要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及时、准确、快速地把党的方针大政传达到广大群众中，使他们真正了解接受党的政策，并付诸于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953年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并指令各级党委把农民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亲自带队下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向农民宣传互助合作的好处，说明互相合作的性质，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道理，引发他们兴办互助合作的欲望，使农民参加互助组的热情空前高涨，全县很快地组织起

互助组8617个，占农户的65%。同年的3月，县委又根据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委宣传部根据县办社“三以三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立场，向农民阐述初级社的性质和组织原则，教育农民树立起农业集体化的观念；以科学技术作理论，教育农民抛弃小农经济思想；以点带面，逐步铺开，教育农民用“点”的经验办好初级社）的原则，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向农民群众宣传办社的优越性。使农村干部群众认识到：农业合作社是农民走向富裕唯一正确的道路。发展生产的唯一大道就是参加农业社。这样，很快地在全县广大农村中，掀起了一个办社热潮。据1956年春统计，全县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713个，入社户数22249户，约占农户总数的五成。但不久，便出现了“三类社”，同时一度刮起一股“退社风”。县委认为，这是关系到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成败和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小农经济老路的大问题，必须及时处理。县委宣传部在县委的领导下，及时组织宣传队分赴各地，以歌剧、演讲等展开宣传教育，组织学校师生下村进行宣讲、出墙报、黑板报、写标语，召开社员大

会、座谈会宣传教育；以《四会农民报》出专刊，编小册子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和坚定了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觉悟和办社的信心，有力地击退那股“退社”歪风，推动中心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原来闹退社的779个农户回来了，并先后把原来的713个初级农业社升级，合并成217个农业高级合作社，入社农户数达52105户，占全县农户数的99%，胜利地完成了高级社的组建任务，大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当年全县完成各种作物13万亩，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14%。

四、提高宣传工作能力，为经济建设服务

在50年代里，每前进一步，或者说每取得一个伟大成就，都渗透着宣传工作者的汗水，都有宣传工作者的功劳。那么，今天怎样做好在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呢？

我党完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工作后，实行改革开放。在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正在发生变化，给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宣传

工作者必须立足于新的实践，在工作中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努力提高宣传思想工作能力，为经济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必须从下列几个方面努力。

学习观念。我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无可避免地带有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资本主义等多种文化交织的痕迹和影响。作为宣传工作者必须自觉地不知疲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江总书记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重要指示，刻苦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善于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当前宣传思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把握社会的脉搏，明辨是非，头脑清醒，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旗帜鲜明地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什么是反科学？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推动革

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占有观念。宣传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去占领。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波助澜，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那么，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用科学的、进步的、民主的和爱国的思想去占领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如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同时，要根据地方的客观条件，建立层级的宣传网络，使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有占有这块阵地，我们才有宣传思想工作的立脚点。

中心观念。我们宣传的目的是推动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我们的宣传工作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紧紧地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并为之服务。宣传工作只有服务于中心，只有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找准位置，发挥优势，体现特色，才能有新的活力，新的凝聚力，才能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群众观念。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我们宣传的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用党的路线、各项

方针政策，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在群众中产生无穷的创造力；把群众的利益及实现这种利益的途径及时地准确地告诉人民群众，调动他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宣传思想工作，只有从群众的观点出发，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以人民满意为最高准则，我们的宣传工作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得到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我们的宣传工作才能得到一展拳脚，发挥其威力作用。

创新观念。虽然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然而生产力的水平比50年代则高得多了。所以，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应随着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个体私营业主、合资独资企业的出现，下岗换岗工人的日益增多，社会城乡现代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老龄人口的增多等实际，我们宣传思想工作，要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研究社会的变革和人们思想活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在发扬行之有效的传统的宣传方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方法，去引导和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需求。

总而言之，我们要取得宣传思想工作的好效果，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只有从

我国，我们地方的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使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严肃执纪是革命事业前进的保证

—— 四会五十年代纪律检查（监察）工作的回顾

樊灶淦

1951年6月，经上级批准，成立了中共四会县（1993年四会撤县设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县纪委（监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的方针，紧紧围绕党的各项政治任务，积极开展纪律检查监察工作，坚决查处党内违法乱纪行为，大大地加强了党员干部党纪法规观念，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促进了我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向前发展。

一、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是搞好党的建设根本保证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为了搞好党的建设，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夺取新的胜利，中共

四会县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必须加强领导，健全组织”的指示精神，成立了以县委书记樊金保同志和副书记方君直同志兼任县纪委书记和副书记的中共四会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还选调了一批党性原则强、廉洁奉公、有一定执纪办案能力的干部担任县纪委委员。1952年3月，全县各区委、支部按要求配备了一名兼职纪检委员，配合县纪委开展纪检工作。1956年3月，县纪委改为中共四会县监察委员会。人民公社化时期，各公社按照县委的要求都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并由一名副书记或党委委员出任监察委员会书记，下属各支部也配备了一名支部委员任监察委员。监察委员会在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纪律检查（监察）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整顿纪检（监察）队伍，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和调整。仅1959年，全县调整纪检（监察）干部就有39人。同时在干部队伍中挑选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同志充实纪检（监察）的队伍，使纪检（监察）队伍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是搞好党的建设根本保证。1950年，全县中共党员只有28名，到1957年就增加到3567名。广大党员干

部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做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里，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仅1958年秋前整党时，全县评出优秀党员就有1199人，优秀党员由整党前占全县党员人数的53.1%增加到68.7%，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政治素质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我县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纪检监察教育工作

对党员进行经常性纪律教育，是党的纪律检查（监察）机关职能之一，也是爱护、培养党员干部，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把全党的意志集中到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上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50年代看，县纪委（监察）机关对党员教育，一般采取：

1、开展经常性党的纪律教育，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意义的认识

纪律是完成工作任务的保证。要使广大党员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完成党的各项中心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模范，那么，就一定要党员首先遵守党的纪律。为了使广大党员自觉

地、不断地用党的纪律约束自己、鞭策自己，各级纪委（监察）机关对党员开展经常性党的纪律教育，做到长计划，短安排，有条不紊地对党员开展经常性的党纪教育。每逢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时，他们都深入到党员干部中去，调查摸清党员干部的思想情况，并在各级党委会会议上，或通过板报、广播等形式，大张旗鼓地对党员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党纪教育，教育他们遵纪守法，避免或减少违纪案件发生。如1958年，我县兴建江谷水库时，县监委工作组深入水库工地，帮助各参战公社党委制订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在大搞水利建设高潮中应遵守几项规定》，广大党员干部不但是修筑水库的先锋，而且又是遵守《规定》的模范，大大地推动了工程的进度，使江谷水库得以如期竣工。

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每一年开展党纪教育，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要求和目标，使党员干部经常处在一个党纪教育氛围之中，在复杂的阶级、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站稳立场，明确方向，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广大党员干部深有体会地说：党纪是

我们战胜困难的法宝。只有遵守党纪，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2、运用典型教育，提高党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典型事例具有发人警省、催人上进的特殊作用。县纪委（监委）在工作中，善于掌握和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在党员中开展党纪教育，不断提高他们执行党纪的自觉性。

为了准确地掌握党员遵纪守法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并运用这些典型在广大党员中进一步开展党纪的教育活动，在1953年“三反”运动中，县纪委（监察）机关绝大多数同志深入农村各地，开展调查研究，掌握一部分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作风严重，违法乱纪，给革命和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的典型事例，并把它写成案例，发到各基层党支部，组织党员认真进进剖析，引导大家结合本地区的斗争实际，摆现象、找根源、查危害、敲警钟，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的立党为公的、党的纪律教育。同时表彰了一批在春耕工作中遵纪守法，埋头苦干，带领广大群众奋力抗旱抢插，完成春耕生产任务好的模范党

员和先进党支部。在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教育下，广大党员执行党纪国法的自觉性得到很大的提高。许多共产党员在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和生产的斗争中做到公而忘私，勇敢地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全县范围内，很快地掀起一个学先进、赶先进，惩治腐败的热潮。广大共产党员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和生产斗争的中坚分子。在生产斗争的过程，群众中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部分还被吸收到党里来。据1954年有关部门的统计，全县发展新党员433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45.3%；新建党支部62个，占全县农村支部的67.3%，并有一批党员优秀分子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大大地促进了我县革命和生产的不断深入发展。

3、建立信访、举报制度

信访、举报处理是纪检（监察）机关行使“惩处”职能的一项基础工作。这对于保护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协助党和政府惩治腐败，促进党风党纪和廉政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51年县纪委建立以来，都十分重视纪检

(监察)的信访、举报处理工作。首先在纪检(监察)机关内成立信访、举报处理工作机构,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建立一套完整的来信来访登记、批转、催办、归档的接访处理制度,及时把党员干部队伍中的思想动态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反馈给纪检(监察)机关,有利于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实际制订有效的党员党纪教育的措施,以便使对党员进行党纪教育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三、实事求是,严处错误

实事求是是我党一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我党处事的一贯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在党纪教育中被揭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和危害革命、影响生产发展的问题,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教育和处理,从而有力促进了党纪教育工作的深入发展。

50年代,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党员积极带领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为胜利完成这个时期的各项中心任务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然而,确有个别党员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的攻击下，失去党性，忘记了党的纪律，生活腐化变质，严重违法乱纪，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把腐败分子清除出党，纯洁党的组织，在革命和生产斗争中真正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县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执行党关于“严肃慎重”、“既坚决，又稳妥”执纪查处的方针，组织力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对重大的案件，还成立专门小组，外出调查，多方取证，反复核实。然后根据案件的性质、错误的轻重，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又坚决不放过一个坏分子。

在查处党员违纪的案件中，为了更准确地对案件的当事人定性，县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允许当事人申诉，并把处理意见与当事人见面，听取他们的意见，根据实情，处理错了就纠正，全错的全纠，部分错的部分纠，不错的不纠。做到查处案件定性准确，手续完备。在建国的头十年里（含1960年），共处分党员576人，在案件的复查中，对一些处分有错的，就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撤销了16人的处分，使他们深刻地懂得；党对自己的处分实事求是，是非分明的。受处分的心甘情愿，下决心痛改

前非；撤销处分的看到光明前途，较好地化解了党内各种消极因素和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同心同德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据195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统计（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比1949年增长74%，极大地推动了我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促使我县顺利地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

依靠政策 加强合作 促进发展

—— 四会五十年代统战工作概述

樊灶淦

1949年10月中旬，四会全境解放了。接着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成立了中共四会县委员会和四会县人民政府。那时，虽然未成立统战工作的专门机构，但县委分工一名领导同志抓统战工作。县委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发动和组织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有效地促进了四会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1955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建立了以顾兆新为副部长的中共四会县委统战部。按照县委的部署，统战部不断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结成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决贯彻执行我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方针和各项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

义积极性。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求大同，存小异，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为完成五十年代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提高认识，摆正位置

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雄辩地证明：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和取得的每一个伟大胜利，都是与我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的成功开展分不开的。因此，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全党对统战工作意义的认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解放初期，党内一些同志认为，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应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建设，忽视、削弱了统战工作，或忘记了统战工作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县委、县府为了及时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对做好党的统战工作意义的认识，结合四会刚解放百业待举的实际，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

务》，使大家深刻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后，统战工作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它的任务已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而是转移到在实现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争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与我党紧密合作，携手建设社会主义上来。县委、县府领导引导大家摆正开展统战工作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始终坚持把党的统战工作贯穿在整个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等各项工作的过程中。各级党政领导在县委、县府的带动下，也积极配合狠抓统战工作，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及广大华侨、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下，全县人民卓有成效地开展生产运动和党的各项中心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并朝气蓬勃地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

二、落实政策，团结朋友

随着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党的统战工作的理论、地位和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建国伊始，如何运用党的统战政策；争取、团结全社会尽可能更多的力量，并肩携手，胜利完成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全

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成为我县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我县各级党政领导在全面提高对开展党的统战工作重要意义认识的基础上，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的政策，在接管敌伪政权机关时，经教育后遴选了一批诚心悔改，愿为新政权服务的伪职人员到我县各级政府机关中工作，化敌为友，为我所用，为新政权开展工作作了顺利的交接。为争取，团结更多的工商业者早日“脱胎换骨”地投入社会工作，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1951年，县委先后筹备并建立了“四会县工商业联合筹备委员会”，广宁、四会合县后，建立“广四县工商业联合会”，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私改”政策。县委统战部刚刚成立就派出得力干部和县“私改”工作队一道，深入工商界各商号店铺，宣传党的有关“私改”政策，用政策去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很快地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如火如荼的“私改”群众运动。到1956年初，全县23个行业200户（364名工商业者）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私改中，县委统战部协同县委县府领导，根据上级有关指示，对我县一大批工商和

知识界的优秀人才落实了党中央关于“政治上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政策，如给予王宗伦、梁永明、叶世才、陈英承等我县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商品的特殊供应；对其他有困难的知识分子给予补助解决；对夫妻两地分居的，则联系商调，使之家庭团聚。同时，还逐步解决知识分子住房和子女就业问题。统战部主动地积极推荐原县工商联主任委员、曾参加广东省工商界代表团赴京的马华参加县府的班子建设，成为我县一名副县长。他们还与有关部门协商，在教师队伍中，培养和吸收了130多名先进分子和青年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提拔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安排了60多个有经商管理之长的工商业者担任厂长、经理、门市部主任，大大优化了党和政府各级组织的知识素质结构。使他们聪明才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统战部根据有关政策，几经甄别，首次为我县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分子”150人中的9人摘掉了右派帽子，并为他们恢复工作等作了妥善安排。此举不但

使右派“摘帽”者感激万分，而且使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对今后的改造感到确有光明的前途，为以后对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和平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1978年止，全县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根据他们的特长，妥善地安排了工作，或办理离退休手续。

四会是我省的侨乡县之一。据1955年统计，我县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归侨、侨眷分别有120000多人和21500多人。在“爱国一家”的统战旗帜下，为了争取、团结更多的归侨、侨眷以及海外华侨对祖国、对家乡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1956年后，统战部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协助有关方面组建成立“四会县归国华侨联谊会筹委会”和“四会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坚决落实有关华侨政策。对归侨、侨眷的生活物品实行特殊供应，还对有特殊困难的发放补助粮。热情接待海外华侨回国观光、探亲，积极帮助他们及其亲属解决在婚姻、丧事、祝寿、建房、修墓和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所碰到的种种困难，逐步消除他们对祖国的疑虑和隔阂，激发他们爱乡报国的热情。同时根据省、地委指示，统战部在县人委的统一部署

下，协同有关单位成立华侨房屋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负责处理土改时华侨房屋退还、修整、赔偿等遗留问题。全县计有华侨房屋198间和66户的门窗得到退还、修整和赔偿。党和政府“有错必纠”的求实精神和磊落胸怀，赢得了海外华侨、归侨、侨眷的由衷感谢和支持。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王绍驹、李以开等人闻讯后连忙致函县侨联会，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这样，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归侨和侨眷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我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基督教神召会和基督教浸信会是我县两个宗教组织。为了争取、团结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弃旧自新，并把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县委坚决贯彻执行党关于“信仰自由”和对宗教组织实行“对其管理，限制发展”，逐步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政策，1953年，县公安机关在镇压反动会道门时，对我县两个宗教组织的活动进行限制。次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我县宗教组织中成立“四会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对其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管理，促使其世界观转变。1958年以后，先后为我县基督教两

名传道士和六十多名教徒安排参加人民公社集体生产劳动。他们在党的政策的感化下，自觉地用辛勤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头脑中陈腐的人生观，成为一名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实践证明：只有不断狠抓落实党的有关统战政策，才能更好地团结海外华侨、港澳台胞归侨、侨眷和社会各界民主爱国人士，结成在新形势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同舟共济，建设家乡

建设社会主义不但要动员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参加，而且还要争取广大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我县的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一贯都有热爱祖国，热爱家乡，踊跃捐资献物，造福桑梓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如当时旅居非洲、印度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侨，为发展我县的教育事业，自发捐资在四会兴建第一间“华侨中学”（后与黄岗中学合并），解决了侨眷和部分群众子女上学读书难的问题。

在五十年代，由于我县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使党和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全党上下，海外华侨、港

澳同胞形成了一股同舟共济建设家乡的巨大力量，保证了我县党的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

1、为解放祖国的大西南和海南岛乃至全国彻底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10月，县支前指挥部动员和组织了全县人民，各商号、店铺，有力出力、有物出物、有钱出钱，很快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一个支前的群众热潮，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我县的木柴、大米、生油、木材等一大批支前物资任务。

2、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积极认购各种经济建设公债，我县人民捐资了5.8亿元支援国家购买飞机大炮；胜利完成了认购折实公债7.56亿元和经济建设公债72亿元（上述统指旧币）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3、在私改运动中，广大工商业者为了发展我县经济，踊跃出谋献策，积极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4036条。如原县火柴厂私方人员苏炳佳发明用固体血清代替牛胶，降低成本5%，使火柴的防潮能力由原来的36%提高到97%，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

4、在农村合作化期间，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第一线，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积极向他们宣传贯彻党的有关政策，使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为完成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5、发展了城乡经济。在五十年代，由于我党坚决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统战方针，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在海外侨胞、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下，真正做到党内党外互相合作、互相监督、互相支持，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各方的积极性，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的艰巨任务，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59年全县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1%，为以后进一步发展我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四会县党组织活动的概述

黎国荣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四会县党组织，在上级党委的关怀领导下，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高举党的旗帜，继续组织党员干部，领导工农劳苦大众，以顽强的革命斗志，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共产党人不避艰险，不怕坐牢、杀头，运用各种方式开展革命活动，满怀信心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来，表现出革命英雄气概，为工农群众树立了光辉榜样。下面是他们主要的活动情况。

一、在逆境中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

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全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可是，共产党人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去夺取新的胜利。

（一）转移九脯，继续斗争

同月16日，国民党四会县当局秉承其主子旨意开展“清党”运动。他们出动大批军队、民团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分子，捣毁各行业工会和各乡镇（堡）农会，收缴农军枪械弹药，解除农民武装。伍明生、莫庭淦、彭拔英等共产党员和一批工农运动骨干不幸被捕入狱。许多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干部被抄家、毒打。那时，四会城乡一派恐怖气氛，官兵横行，恶霸当道，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被镇压下去了！这就是四会历史上称之“4.16事件”。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四会县特别支部（下简称四会特支）书记莫萃华及时把支委唐少彬、雷锡南等共产党员和一批工农运动骨干转移到群众基础好的一区清东乡九脯村隐蔽，避敌锋芒，伺机斗争。

敌人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四会共产党人。四会特支研究决定，以九脯村为基地，以

该村江家祠为特支的立足点，针对当时的形势组织力量，继续领导工农大众开展对敌斗争。以特支书记莫萃华为首带领党员张绍田、申金连和部分农运骨干到各乡（堡）村寨，一面了解“4.16事件”后敌人破坏农会、农军情况；一面联系原来农运积极分子和串连农户，安抚被抄家属，召开秘密会议，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破坏农会、农军的罪行，阐述敌人貌似强大、实为虚弱，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的道理。同时指明今后斗争的方法和方向，激励农民群众挺起腰抬起头，坚定信心，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夺取新的革命胜利。以支委雷锡南和党员赖谷良为领头，组成一个宣传鼓动组，编写、油印《告四会人民书》标语、口号，分别到各村寨尤其县城街道、工厂、码头、会馆、公园乃至县署机关、警察、民团营房张贴和散发，鼓舞群众，策反敌人，揭穿国民党右派破坏工农运动，破坏国共合作，号召各界群众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国民政府，为死难的工农同胞报仇。通过他们的宣传教育活动，广大工农群众深受教育，知道共产党人没有走，仍然领导工农运动，很受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和斗

志，革命的斗争热情又日益高涨起来了。

《告四会人民书》和革命标语、口号在四会城乡出现后，吓得敌人坐卧不安。国民党四会当局立即下令军队戒严，指令警察、民团、密探搜查旅店、会馆，封锁街道、码头，严密检查行人。这些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工农群众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与敌血战江家祠

中共四会特支在组织宣传工农群众重新起来坚持斗争后，引起了国民党四会当局的密切注意。他们一面出“花红”追缉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一面派出探员侦查四会特支人员下落，妄图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达到其镇压工农运动的目的。

“4.16事件”后的5月下旬一天，驻守清东乡民团团丁潘碧初知道四会特支在九脯村活动情况，急忙到县城向四会民团团长李敬五报告。李敬五随即请示四会当局出兵“围剿”。李受命后秘密找大堀民团团长苏淦棠部署，并命令他率200多团丁，于29日深夜包围九脯村，围剿江家祠，捉拿四会特支人员和工农运动骨

干。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星光，大地漆黑一片。敌人进村时，村中家犬狂吠，警醒了许多“堡垒”村民。他们见民团鬼鬼祟祟入村，马上通知住在群众家里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干部。在群众的帮助下，这些党员和农运骨干安全离开了九脯村。但是，住在江家祠的莫萃华、唐少彬等10多人来不及通知，被敌人包围了，情势十分危急。敌包围江家祠后，不知祠里力量的虚实，不敢贸然进祠搜索。当时，四会特支只有唐少彬一支短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怎样突围？为了保存党的力量，支委唐少彬提议，在祠堂后面破墙，由书记莫萃华带领撤退，并自告奋勇单枪应战，掩护突围。在突围前，大家同声高喊杀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转向祠堂正面。突围计划果然奏效，莫萃华、雷锡南等人安全突围脱险了。当时，唐少彬冲出祠堂门口与敌战斗，在枪战中不幸中弹，血溅江家祠，壮烈牺牲了！凶残的苏淦棠为了回去请功领赏和威吓民众，竟把唐少彬的耳朵割下来，并弃尸路旁暴晒示众。这是国民党四会当局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制造杀害共产党人又一宗惨案！四会革命斗争史上称之为“江家祠事件”。至此，四会的工农运动和党的组织活

动暂时停止了。

二、建立中共四会县委，继续领导工农运动

1927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汉口“八·七”会议精神，派出大批干部到各地去，恢复和加强各地党组织的领导。10月，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四会县委员会，任命赖谷良为书记。县委建立后，坚决执行以武装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总方针，积极领导工农运动。赖谷良首先在县城和龙头堡、九脯、藤村、大沙、马陂等地联系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当地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向他们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指示，重新组织工农开展革命斗争。10月底，县委书记赖谷良又在龙头堡召开一次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员有赖世森、张大芳、江荣、程生、叶宗三、李灶、杨木、李木等人。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是抓紧时间发展新党员和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迅速壮大党的力量；二是派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深入群众基础好的农会、工会去，串连发动当地的工农群众，帮助他们建立秘密农会、工会。会后，经过他们一段时间的活动，至1928年初春，先后吸收发

展党员30多人；在县城建立了理发、碾谷、咸杂3个工人党支部；在龙头堡、清陶塘乡建立2个农村党支部。这为工农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打下了组织基础。

1928年4月29日，中共广东省委调赖谷良任汕头市委书记，由陈强任四会县委书记，并按省委的指示，在县城一个秘密地方召开中共四会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选举陈强、赖世森、杨木、程生、李灶、张大芳、宋秀山、叶宗三、吴自新等9人为县委委员，陈强、张大芳、程生、杨木、赖世森等5人为常委，陈强为书记。会议作出7项决议：加强城乡党的组织建设；建立军事委员会，由张大芳任军委主任，并派党员到四会当局控制的警察局、护航队、游击队中去做兵士工作，争取控制樊六民团；龙头堡的党员出县城训练；扩充兴顺、黄岗、藤村3个农村党支部；整顿清陶塘党支部，各党支部要调查工农兵目前生活问题及其它情况，准备鼓动斗争；每星期油印出版一次工农小报，指导工农运动斗争；加强各行业党组织和党员的组织工作。这些决议，为发展当时四会的革命形势和工农斗争指明了方向。会后，县委成员按县委分工到各自负责的地区加紧工

作。经过大家的努力，在县城建立了一个区委，由宋秀山任区委书记。在县城的新隆街、龙桥、高街、仓岗街和大沙圩成立了5个党支部。在龙头堡、黄岗、藤村、兴顺、白沙等乡建立了8个秘密农会。在县城建立了钢铁、理发、烟丝、碾谷、咸杂、革履、商业、杂货等9个秘密工会和1个全县性的革命工人联合总会。此时，四会党的组织和工、农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发展，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力量。他们在中共四会县委的领导下，工农运动的斗争又逐步开展起来了。

三、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对敌斗争

1928年2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制订了《西江暴动工作计划》，在西江北岸以广宁县为中心开展农民暴动。四会县委按《计划》要求，组织力量，积极配合广宁农民暴动斗争。他们一面派遣得力的共产党员李木带部分农军干部前往黄田江头，与当地共产党员陈伯贤、张振尧等人组织了一支近40人的农军，挺进五指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反动统治，一面组织工农群众在四会城镇开展“飞行集会”宣传，揭露和控诉国民党右派破

坏国共合作、破坏工农运动的罪行，号召各界民众团结起来，推翻其反动统治。同时在四会城乡举行罢工罢课，策应五指山等地的农民暴动，牵制敌人，支援斗争。这支农民暴动武装建立后，不断打击敌人夺得胜利。

同年4月下旬，敌黄田乡长张文桢伙同石狗民团头子刘世邦率民团数十人，前往五指山进剿农军。农军领导人陈伯贤、李木获悉情报后，立即部署力量，把农军分成两队，分别埋伏在王爷庙两侧山窝，伺机歼灭来犯之敌。张文桢和刘世邦率团丁来到王爷庙时，看见庙四周的山峦重叠，林木参天，山径山溪迂回曲折，地形十分险要，心里害怕农军设伏，不敢进山搜索。敌稍时休息后，为了向其上峰交差复命，令其团丁胡乱开枪，准备拉队回营。埋伏在王爷庙两侧山窝的农民武装听到枪声，以为是敌人进山搜索，大家都严阵以待，决心与敌决一死战。可是，枪响一阵后沉寂下来，不见动静。李木、陈伯贤等分析，断定是敌人害怕农军伏击。敌人的行动果然不出农军领导人之所料。于是，李、陈决定趁敌人心里害怕拉队撤走时，来个两面夹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不一会，敌人开始撤队，埋伏农军在陈伯贤、

李木、张振尧的指挥下，立即冲出山窝，以猛烈的炮火向敌人射击。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把敌人打得昏头转向，四散奔逃。此战，打伤和俘敌数人，缴枪数支，重创敌人威风。

这支农民武装，在五指山区转战了一个多月，后来因四会、广宁两县民团不断前来围剿又因粮食、弹药供给困难，被迫解散了。这次农民暴动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对各地工农革命群众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其影响是深远的。

四、县委遭敌破坏，革命转入低潮

中共四会县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党的组织健全发展了，力量加强了，同时秘密组织工会、农会开展工农斗争和农民暴动等都有新的进步，给国民党右派予以有力的打击。可是，中共四会县委的建立和工农运动的新发展，引起了四会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注。他们组织了大批军队、民团镇压，逮捕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干部，新建立的县委和工、农会遭到破坏。1928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四会县委机关在省委的关怀和帮助下，再次建立起来，继续组织工农群众与敌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加上敌人频繁打击活动，四会县委又遭破坏。同年12月6日，县委书记陈强调离四会，由程生任县委书记。1929年3月以后，国民党四会当局对中共四会县党组织的活动，采取的镇压措施更严厉，手段更毒辣凶残，全县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此情况下，部分党员和工农运动干部不得不转移到别地隐蔽，党的组织不得不解散。从此，四会党的组织活动和工农革命斗争转入了低潮。

在革命低潮中，一些共产党员仍在坚持斗争。转移广州的李木、伍学南、陈柏贤等，自筹资金在广州沙基开办了一间天南理发店。他们以理发为业，掩护身份，联络在革命失败后失去党组织联系的四会、广宁两县的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干部，伺机再建党组织，继续与敌斗争。

浅述四会县的肃反及其历史作用

黎国荣

1955年12月，四会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革命队伍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指示精神，和省、地委的战略部署，在党、政机关和学校、厂矿、水上等企事业单位，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通过运动，有效地挫败了敌人妄图颠覆破坏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进一步纯洁了革命队伍，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回顾总结这段肃反斗争，有其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历史作用。

一、运动的背景

四会县（1993年撤县设市）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西北端，是通往粤西北的咽喉之地。解放前，四会是广宁、怀集等县的竹、木、柴、炭等山货运往省内各地和广州、佛山等城市的工

业品、日用百货运销上述各县的集散地。因此，许多客商巨贾、军政要员和各种人员来往频繁，使四会城乡各业比较兴旺；同时又使四会复杂化。当时，四会县与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一样，存在许多反动势力的基础。这些反动势力的人员在解放后仍为其主子卖命，钻进我革命队伍里，躲藏在阴暗角落伺机卷土重来，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据调查了解，当时四会境内有乡以上军政要员350多人；有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3个反动党团。建立国民党县党部1个、区党部17个、区分部45个，共有区分部以上执委392人。有县三青团总团1个，下建立有5个区队和45个区分队，共有分队长以上骨干80多人，其队员分布全县各个区、乡。县内除有一批民社党员外，还建立自卫队、侦缉队、联防队等地方团队450多人。此外还有惯匪、汉奸、特务等200多人。这些人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曾多次围剿游击队，捕杀我地下工作人员。在四会解放时，这些人相当部分被我人民政府教育从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却有部分逃往外地，有的潜伏下来，他们按其主子的意旨，千方百计钻进我革命队伍，伪装进步，骗取领导信任，窃据部门要职，作垂死挣

扎。在接收伪政权时，为了稳定社会，吸收了部分国民党四会县的旧军政人员和旧基层干部参加革命工作。他们大部分能依我政令办事，可是却有一小撮人，不思悔改，与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散播反动言论，暗地进行破坏，搞乱社会秩序，颠覆人民政权。当时，四会和许多地方一样，一些机关单位泄露机密，一些街道、学校和工厂、农村出现“打倒毛主席”、“打倒共产党”的反动标语，以及在上述地方爆炸仓库、毒死耕牛和塘鱼等时有发生。党中央根据各地情况反映，高瞻远瞩，分析全局，驾驭形势，为了建设好革命队伍，纯洁革命组织，更好地领导工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于1955年7月果断作出指示，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肃反运动。

三、运动的始末

1955年12月，四会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和广东省委、高要地委的部署，结合四会的实际，开始着手肃反工作。他们首先成立肃反领导机构，以县委第一书记韩志洲为肃反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刘国欣为副组

长，组员有刘永清、杨世南、高初商、张庆君、席金柯、谢桐升、麦冬祥、周瑞友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刘永清、杨世南、高初商分别为正、副主任，具体领导各线单位开展肃反工作。为了搞好肃反工作，四会县委先后选调了260多名可靠干部和教师充实各办公室力量，同时成立7个核心小组加强领导工作，在全县185个单位，分成7大组3批，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肃反运动。运动大体分成3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材料阶段。这一阶段先组织有关的肃反领导和干部学习党中央有关肃反指示和政策，武装思想，明确任务和做法，然后对开展肃反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排队，按初步掌握的材料排出“重点对象”。同时对“重点对象”的现成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找疑点，寻线索，分别列出其问题。在此基础上，组织力量内查外调，取证“重点对象”的犯罪事实。核心组反复研究，分析所得材料，去伪存真，形成专案。

（二）坦白检举、“和谈斗争”阶段。此阶段的主要做法是：组织基本队伍，培训“和谈斗争”骨干，学习有关政策和文件资料，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做法要求。进而召开全体干

部职工大会，宣读肃反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党中央制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敦促“对象”坦白交代犯罪事实，并动员干部职工（包括“对象”）检举揭发。同时，组织骨干协助核心组成员，采取策略，耐心细致地与“对象”摆事实，讲道理，开展“和谈斗争”。通过斗争，促其坦白和揭发，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

（三）专、定案处理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前两阶段调查和检举坦白及其历史等材料进行整理，综合分析立专案，并逐一复核落实。各核心组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复核材料，按党的有关政策作初步处理意见，送上级核心组审批。最后县肃反领导小组复审定案；定案后，审定结论与“对象”见面，作出合情合法合理的处理。

在肃反过程中，由于县委重视，加强领导，不断充实办案力量，很快就动员组织185个应参加单位的10898个干部、职工参加运动，占应参加人数的99.2%，加快了肃反工作的步伐。经过上下的共同努力，尤其肃反干部艰苦深入和细致调查研究工作，于1958年12月，历时3年的肃反胜利结束了。期间，发动干部职工

检举揭发和深入的调查，在革命队伍内查出有问题的干部、职工901人，其中证据确凿属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104人。在这104人中按性质分类：反动党团骨干分子22名，特务分子13名，恶贯满盈土匪15名，汉奸2名，伪军政宪骨干分子23名，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4名，叛徒3名，现行反革命分子5名，其它坏分子17名。同时查出普通反革命分子和一般的坏分子99名。对上述这些“分子”处理，按政策规定，认罪好，揭发有功，坦白清楚，问题又不大的，留在革命队伍继续使用；认罪态度差者，开除公职；是党员则清除出党；情节严重，触犯法律，有意隐瞒历史罪恶的，则交由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三、运动的作用

(1) 干部、职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敌情观念教育。肃反前，在干部、职工中存有“三无思想”。一是无敌思想，认为经过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等运动，该捉的已捉了，该镇压的已镇压了，现在没有什么“敌”可肃了。二是无关思想，认为肃反是公安机关的事，与我关系不大。三是无怕思想，认为严

重的反、坏分子已基本肃清了，有的都是一些“小鱼”，“小鱼”翻不起大浪，没有什么可怕的。在肃反中调查、揭发出来的反、坏、敌、特等分子有的隐藏在革命组织和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或明或暗，用言论或行动诽谤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的与社会上的反、坏分子互相勾结，贴反动标语，炸桥梁、仓库，毒死耕牛、塘鱼，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破坏生产，扰乱市场等等。这一件件、一宗宗破坏事件，使广大干部、职工大吃一惊！公私合营某单位查出一反革命分子与商业市场的不法分子勾结一起，垄断市场，乱提物价，扰乱市场秩序，使人民生活一时陷入困境。该单位的干部、职工醒悟地说：“敌人同我们一个单位工作，在我们身边搞破坏活动，我们却不知道，太麻痹了。”通过肃反运动，广大干部、职工大大克服了“三无思想”，加深了对敌的警觉，提高了对敌斗争观念。大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看人办事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在大好的形势下，忘记对敌斗争。

(2) 纯洁革命队伍和培养提拔使用干部都起到重要作用。实践证明，革命队伍的好坏，是直接关系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与否的大问题，必须要下大决心把其建设好。因此，党中央明察秋毫，清除革命队伍内的反、坏分子，纯洁革命组织，建设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队伍。四会县委按党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和要求，以确凿的事实证据，清查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犯有严重罪恶的反、坏分子100多名和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400余名。从而使四会革命队伍得到了进一步纯洁，并使许多单位形成有战斗力的集体。同时又掌握了大批干部政历、思想、立场、工作等要况，对今后提拔任用干部清楚有数，可做到知人善任，量才使用。在肃反运动中，四会县委在深入发动组织干部、职工进行肃反工作的同时，认真挑选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立场坚定、政治思想好、革命斗争性强、工作艰苦负责的干部、教师。在运动后期，先后发展党员333名，共青团员166名；民主评选出432名工作积极分子。根据革命发展工作的需要，四会县委通过组织部门，在这些优秀干部和积极分子中，先后提拔139名干部为县、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任科、股级领导，任命77名教师为各级学校校长、教导主任，不断充实和加强各单位领

导力量。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

(3) 对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积极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靠党的方针政策，靠党的坚强领导。这些方针政策和党的坚强领导是要通过各级广大干部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分共同贯彻执行，把它化为行动，方可达到目的。经过肃反运动的四会县广大干部、职工，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以高度的对敌斗争警觉，认清了革命形势，振奋建设精神，在党的领导下，朝着党指引的道路，鼓足干劲，投入当时的革命、生产斗争中去夺取胜利。比如，工作在私营工业、手工业的干部、职工，经过肃反教育后，以对敌斗争那种精神，树雄心壮志，按党指引的方向和制订的政策，于1957年始，建集体工业，在广大干部职工的奋斗下，仅一年时间就先后把全县私营工业、手工业合并成58家，其中工厂11家，生产合作社20个，生产合作小组17个，使私营工业、手工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又如，党政机关的广大干部经肃反运动教育后，更是激情满怀。他们遵照党中央和省、地委部署，一面开展肃反工作，一面抓紧革命生产工作。为了加

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他们在县委的领导下，在柑榄乡艰苦深入搞初级农业社并高级农业社试点，及时总结点上经验，指导全面工作，很快就把农业合作化推向高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干群共同努力，于1958年春，就先后把713个初级农业社，合并成217个高级农业社，参加高级农业社农户达52105家，占全县总户数99%，胜利地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伟大任务。

澳门的精英 抗日的先锋

回顾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在四会的活动

黎国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共港澳组织的领导下，以共产党员陈少陵、廖锦涛和归侨爱国人士杨岭梅在澳门先后吸收了青年、教师、工人、店员、归侨等精英共54人，组建了一个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下称旅澳服务团）。陈少陵带领该团在澳门和珠江两岸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记述他们在四会活动的事迹。

一、加入“税警”，共赴国难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广东省税警总团（下称省税警团）撤退至四会，与该县国民兵团驻马房、大沙一带，踞守北江西岸抗击侵

略日军渡河西犯。为了增强抗日力量，省税警团招收人员成立政治工作大队，宣传组织民众共同抗敌。同年冬，正在西江地区活动的旅澳服务团，通过爱国人士李之华的推介，并经请示中共西江特别委员会（下称西江特委）批准，由陈少陵带队陆续加入省税警团政训处政治工作大队。这个大队先后吸收了200多人，是一支新的抗日队伍。主张抗日的省税警团政训处处长田竺僧对旅澳服务团参加政治大队工作十分重视，委任陈少陵、包华（共产党员）为上尉视察员，负责全大队领导工作。政治工作大队的建立，为开展宣传、组织民众抗日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时，西江特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旅澳服务团内有10多名共产党员的实际，为更好地推动省税警团抗日，决定把其组织关系交四会特支联系领导，并在政治大队成立中共支部，指定陈少陵任书记。1939年3月，西江特委又决定，成立中共四会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下称四会临委），政训处中共支部升格为特别支部，又指定谭丕桓、陈少陵分别任四会临委书记和政训处特支书记。同时指示陈少陵在四会临委领导下，在其下属建立党小组，将政治工

作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政训处政治工作大队党组织的建立，为该大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确立了党的领导核心。

政治工作大队在省税警团和政训处中共特支的双重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其合法身份，一方面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参加该团军训，训练杀敌本领，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一方面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深入士兵中间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激发官兵的爱国主义、为中华民族存亡而战的热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坚定抗战立场，军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前线抗日部队打胜仗时，他们又组织慰问团前往慰问，并把他们的事迹撰写成宣传资料，编成短剧、诗歌，出墙报或到各个连队、墟镇宣讲、演出，进一步激励将士驱逐日寇，保卫祖国再立新功。政治工作大队的行动，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

二、宣传民众，团结抗日

政治工作大队建立后，陈少陵、包华等经请示有关领导同意后，把政治工作大队分成六个小分队和一个艺宣队，各队建立党小组，安

排共产党员任队长，分别派驻邓村、大沙、龙头、铁场、下茆、上林和四会镇等地。各分队在这些驻地按照政训处和特支的指示要求，满怀激情、夜以继日地奔走呼号，进行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活动，唤起民众，团结和组织各界人士共同抗敌。他们的主要做法有：

(1) 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他们分成队、组，在墟镇的公共场所，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铁蹄下的歌女》等短剧和演唱《在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黄河颂》、《全国总动员》等抗日歌曲。他们的表演真实生动，维妙维肖，民众十分欢迎，深受鼓舞。在街道、村寨演讲或出墙报，粉刷“抗日救亡，保家卫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民众认清形势，抗击日军侵略情绪日益高涨，参加抗日斗争行列的民众不断增加。那时，抗战歌声洋溢整个四会城乡，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

(2) 开设夜校和识字班。各分队队员深入村寨农户，动员组织男女青少年上夜校，按其文化水平高低，分别开办青年班、妇女识字班和少年儿童班。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组织起来的校、班共有50多个，参加学习的近3000人。

在校、班里分别上《大众哲学》、《论持久战》和自编的抗日文化知识课程；同时谈时事，论保家卫国道理，讲述全国各地军民团结抗击日寇英雄事迹，激励他们为拯救祖国出力。他们开展这些活动，一方面提高了民众文化知识和抗日斗争觉悟；一方面把民众团结起来抗日，监视敌特活动，维护社会治安，推动救亡工作深入开展。

(3)举办青年训练班，组织战事后勤力量。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前线，有力打击日本侵略军，各分队都在驻地举办青训班，组织自卫队，学习政治、军事，开展军训；同时讲授包扎医疗知识，学习抢救伤员技能。期间，他们先后动员组织近5000名青年男女参加训练，并把他们编成武装自卫、运输、担架救护等20支多队伍，为前线战事服务。青训班为当时四会乃至三水的抗日救亡起了重要的作用。

(4)组织“空室清野”演习。各分队根据上级有关的指示，以各驻地为中心，组织群众性的“空室清野”演习。演习时，假设日军入侵某地，各农民自卫队和运输、担架队一齐出动，帮助民众扶老携幼掩蔽，将猪、牛、家禽和财物、食品等转移收藏起来，并在公路设

障，于水井放“毒药”，使敌进来难以驻守、生活；其运输、担架队为抗日部队运送粮食、弹药和救护“伤员”等。“空室清野”演习，对于加强防备敌人入侵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旅澳服务团在中共政训处特支和政治工作大队的领导下，在四会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搞得如火如荼，为阻击日军渡河西犯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奔敌前沿，英勇斗争

为把抗日救亡工作推进前沿，1939年5月下旬，四会临委根据西江特委决定，指示政训处特支在该处政治大队组织服务队前往三水前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政训处特支接指示后，通过取得省税警团政训处同意，以旅澳服务团成员为骨干，在各分队青训班抽调四会青年组成一支120多人、以肖德根、潘达为正副队长的“四会青年三水前线服务总队”（下简称服务队），奔赴三水县的元潭、洛平、小迳、陆洞、桃布、三江、官窑等地乡村。在当地地下党的指导下分成六个工作队和一个武装班，日夜进村串户、走墟过市，召开会议、演讲、演出和出壁报、刷写标语、口号，宣传共产党的

主张和方针政策，宣传全国各地抗日斗争形势，动员组织民众联防抗日、惩治日军的烧杀抢掠。在工作中，敌人发现服务队的活动后，一方面派遣汉奸特务到处侦探服务队行踪和民众联防情况，进行破坏；一方面指派飞机进行轰炸。敌前抗日救亡工作一时受阻，队员和民众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一次，服务队住宿汉塘村，汉奸特务知道后立即向日敌机关报信，敌马上指挥飞机前来狂轰滥炸，一名姓温队员中弹牺牲。此事激起队员和民众极大义愤，要求捉拿汉奸严惩。副队长潘达和元潭地下党员区长赵元浩迅即带武装班，奋不顾身，英勇追捕。在民众的支持帮助下，很快把“通水”日敌汉奸抓获，并押回元潭公开正法。锄奸工作的开展，使敌前沿的抗日救亡运动较为顺利进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宣传组织工作，三水敌前沿抗敌救国运动逐步高涨起来。7月服务队撤出三水回四会，整训待命。

1940年1月，省税警团改编为暂八师，全师奉命开赴清远前线抗敌。政治工作大队负责沿途宣传、茶水供应和组织运输、担架、救护队工作，并带领队员上前线支援抗日。在战斗中，三、四百名队员不怕苦，不怕死，冒着枪

林弹雨运送粮食、弹药，抢救伤员。梁自奉、潘达等政工队员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还冲上最前线与士兵一起共同打击敌人。经过5天的紧张战斗，终于把日敌打退，取得了清远战斗胜利。在战斗中，政工队员及其组织的运输担架、救护等人员为前线部队运送粮食、弹药数百吨，抢救伤员200多人，并在宣传、后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丹心为党国 热血写春秋

记述陈少陵烈士

黎国荣

陈少陵又名陈长游，是中共党员。他有一个特点：不管去到哪里，他都能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他短暂的一生，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受到人们的尊敬。

1939年8月，中共西江特别委员会在四会、三水进行“肃托”斗争时，他被西江特委错误地内定为“托匪”，开除了党籍。他虽然受到如此打击，但他为了全民族抗战利益，抛开个人的恩怨，坚信党始终会弄清其问题，仍坚持为党的革命事业和国家的存亡而工作直到牺牲。1984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中共肇庆地委复查平反了“肃托”事件，为陈少陵恢复了党籍和名誉。1985年3月，广东

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下面记述的是他的简要事迹。

(1) 1906年，陈少陵出生于广东省台山县（现称市）汶村北拱东巷一户农民家庭。他青少年时，深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热爱祖国，勤奋好学，上进心强，有正义感，对工农大众富有同情心。那时，他目睹地主豪绅横行乡间、鱼肉民众，广大贫苦人民终日劳累还要受饥挨饿，甚至卖儿卖女，露宿街头，过着牛马不如生活的悲惨情景，就立下心愿：为解救劳苦大众而努力奋斗！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感召和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年仅18岁的陈少陵满腔热情地投身台山县农民运动，为农民的翻身解放贡献力量。他参加农民革命后，在中共台山县组织和农会的领导下，与农运骨干分子一起，不辞劳苦，日夜走村过寨，向农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地主豪绅压迫农民的罪恶行径，动员组织农民团结起来建农会、闹革命，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斗争。由于他工作勤奋，待人诚恳热情，办事公正负责，深得农民拥护和爱戴，成为农民的知心朋友和农运骨干分子，在贫苦大

众中享有较高威信。

(2)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台山县国民党当局秉承其主子旨意，不遗余力地对该县农运领导和骨干分子实行大搜捕，下令通缉陈少陵。在严峻的形势下，陈少陵不得不离开家乡，几经辗转到了马来亚。在那里，他为了生活先后为庄园主种过蕉、橡胶，也替场主挖金淘金。他虽然如此奔波劳碌，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经常在华侨工人和当地青年中间串连，广交朋友，结识进步人士，从中宣传“十月革命”道理。由此，他与马来亚共产党员王君烈等交上了好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久，由王君烈介绍其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组织。他参加“马共”后，更加刻苦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更加广泛接触工农群众，更加积极勤奋工作。在工作中，陈少陵关心群众疾苦，乐于助人解困，陈少陵成为当地群众和华侨的真挚朋友。当地的群众和华工有什么事情都来找陈少陵商量，得到其帮助，受到人们敬重。

(3) 1934年前，陈少陵在马来亚进行的革命活动中，因暴露了身份，被当局指名缉捕。

因此，他与王君烈等离开马来亚辗转到澳门。在澳门，他继续坚持革命活动。在其叔父的帮助下，把胞兄从美国寄回来给他作结婚用的3000美元为资本，同程志青、王君烈等于板樟堂街开办一间“小小书店”，他一面出售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一面又与程、王等人学习、研究革命理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小小书店”，吸引了众多青年师生、工人、店员经常到书店买书、看书，成了宣传马列和团结、教育澳门各界人士，特别是青年的重要场所。

“西安事变”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此时，陈少陵与澳门地下党员廖锦涛接上关系，并与包华、杨岭梅等人组织青年参加“读书会”、“抗日救国会”、“抗日小组”、“救亡歌咏团”等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在这些团体中，陈任理事，亲自抓组织教育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各团、会，使这块殖民地的抗日救国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期间，陈少陵千方百计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后来经中共中山县工委组织干事叶锦泉（现名向荣）介绍和书记孙康批准，由“马共”党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陈少陵对党的事业更

加忠诚，努力工作。为了教育和团结更多的民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经常深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街道与各界人士谈心，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一次，少陵了解到邮递工人、“读书会”会员邹庭患重病去世，因生活困难而无钱殡葬，即发动“读书会”、“救国会”等团体会员捐助，为邹家办理后事；同时募捐了一笔钱给邹庭遗属，使其渡过生活难关。此事不仅令邹家亲朋感动不已，而且所有的知情人都把陈少陵视为知心人。

(4)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陈少陵奔走呼号。八、九月间，在中共港澳组织的领导下，他和廖锦涛、杨岭梅等商议组建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下称旅澳服务团）回内地宣传民众抗日。为了做好回内地的抗日救国宣传工作，陈少陵一面组织团员学习和编写宣传资料，排演歌剧；一面组织人员到香港、广州等地向各界人士募捐，并在两地设办事处。他还亲自与陈直生等前往香港召开记者会，公开宣布旅澳服务团的宗旨，以扩大影响，争取各界人士支持。

10月，陈少陵亲率第一批旅澳服务团离澳门到江门、新会、开平等地乡村，以演戏、唱歌、写标语、街头演讲等形式宣传发动民众抗日救国。他们所到之处深受广大民众欢迎。12月30日，旅澳服务团在开平三埠活动，全体团员却遭国民党广东省第四路军绥靖公署以“乱党”的罪名逮捕，解到广州南石头监狱关押。在狱中，陈少陵镇定自如，团结全体团员与国民党当局说理斗争。不管是军法处的严刑拷问，还是威迫利诱，都没有使陈少陵等人屈服，充分表现出共产党员无私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后经我党和各界爱国人士及“七君子”的多方营救，国民党当局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宣告无罪释放陈少陵等一批被捕团员。

1938年8月1日，为了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民众，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陈少陵按党的指示，再次率旅澳服务团回中山县九区宣传抗日救亡。他们在当地地下党梁庶坤、梁伯雄、陈君海等大力支持下，分成3个小队到大黄围、牛角、大场南乡等地，宣传发动民众组织秘密武装和青年会、妇女会、民众夜校，教育各界人士抵抗日军侵

略。那时，日本侵略军已入侵中山，其装甲船、橡皮艇在大坊南乡的河面上肆意横行，奸淫掳掠。为了打击侵略日军的嚣张气焰和振奋群众的抗日精神，陈少陵和当地党组织研究，决定带领抗日武装和旅澳服务团及群众对来犯日军进行阻击。在大家同仇敌忾的打击下，迫使日军狼狈撤走。这一行动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5) 1938年10月，由于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势力的阻挠，旅澳服务团离开中山到西江地区活动。11月，通过爱国人士李之华推介，经中共西江特委批准，陈少陵带旅澳服务团成员陆续加入驻防四会的广东税警总团政训处政治工作大队。他和包华被委任为该队视察员。西江特委考虑到四会是抗日前线和旅澳服务团内有中共党员10多人的实际，为了便于领导和工作，决定在政训处建立中共支部（后升格为特别支部），指定陈少陵任支部书记（后任特委书记），其关系交给中共四会临时工作委员领导。陈少陵根据党的指示和形势的要求，利用合法身份，深入税警团官兵和四会当局及人民群众中间，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人士抗日。同时，亲

自到各分队去组织开展演讲、演戏、写标语、出墙报、办夜校青年训练班、妇女识字班和搞联防、“空室清野”等活动。随后，陈少陵又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求，在政治工作队和四会青年中组织了一支120多人的“三水前线服务队”开赴三水各地乡村，唤起民众，共赴国难。由于陈少陵出色的领导和党员、队员的共同努力，当时城乡特别是抗日前线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据不完全统计，先后动员和组织了战时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等共四、五千人；在抗日救亡活动中，陈少陵在四会还先后培养发展中共党员10多人，使党的组织在四会农村中增加了力量，受到中共四会党组织的赞扬。

(6) 1939年5月，国民党广东省当局调税警总团政训处长田竺僧出任三水县长。田要带陈少陵、邓茵、赵元浩（邓、赵均是中共党员）等10多人陪同前往。陈少陵将此事请示中共四会临工委，四会临工委即请示西江特委。西特书记王均予认为这是把党的工作推向三水前线的大好机会，批准陈少陵、邓茵等前往三水，并决定在三水县国民政府中建立中共特别支部，改任陈少陵为三水县政府中共特支书

记，指定中共四会临工委书记谭丕桓负责联系、领导特支工作。

在三水期间，陈少陵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积极慎重发展中共党员。从1939年5月至8月，先后吸收陈明森、李伟洪等14人入党，使三水县的中共党员成倍增加；二是宣传组织民众抗日。他与“三水前线服务队”一起，先后在大塘、元潭、洛平、三江、官窑、小迳、大勒等地宣传联防、锄奸等活动，推动了这些乡村抗日运动深入开展；三是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国民党正规军、地方团队和行政机关做统战工作，对他们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坚定他们的抗日救国立场。通过这些活动，不断推动了三水前沿抗日运动的开展。

(7) 在四会、三水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党的建设得到不断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于1939年8月，中共西江特委的主要领导人怀疑税警团中共政训处特委和三水县政府中共特支混进“托匪”为由，错误决定在四会、三水进行了“反托派”斗争。陈少陵被错定为“托匪”，被开除了党籍。陈少陵虽然受到这样沉重打击，但始终没有失去斗志，因为他自知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更不是“托派”分子，

坚信日后党会弄清此问题。他没有埋怨党，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恩怨，坚持不懈地与政工队员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2月15日，他在四会白沙公干的时候，遇上日机轰炸。陈少陵为保护和抢救民众生命财产，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3岁。陈牺牲后，税警总团部分官兵、政治工作大队的党员和队员三、四百人为他开追悼会，把他的遗体葬在四会县城的野狸岗上。

陈少陵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对党和国家忠贞不渝，对敌憎恨，对己严，对人宽，是我党的一位好领导、好学员、好干部。他那无私无畏的品德和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永垂青史，一定会激励后人拼搏进取，奋发向上。